

圣智尊刊

中共安徽省委党校图书馆主办

2018

NO.1

总第1期

目 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经济思想学习资料专辑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王东京（1）

从《资本论》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探源董瑞华（6）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内涵及指导意义

.....周跃辉（16）

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思想研究纪志耿 祝林林（21）

2018 年经济工作思路和重点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解读王小广（28）

习近平经济思想开启中国经济新篇章杨宜勇（36）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宏观调控体系布局

.....高培勇（4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金融思想王立民（43）

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全球治理行动框架张新 胡鞍钢 周绍杰（49）

不断巩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中央党校经济学部（58）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新时代经济建设的总纲领刘志彪（61）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邹薇（67）

在新发展理念引领下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金碚（7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内涵

.....杨秋宝（77）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刘伟（80）

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王晓东（83）

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中的绿色考量葛新权（86）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王东京

前不久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行动指南，对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指导意义。

1、“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确立了主线

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更要同我国经济发展实际相结合，不断形成新的理论成果。在2016年7月8日召开的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他又强调：“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推进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科建设。”

建设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首先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宣告：“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代表作《资本论》从商品的二因素和劳动二重性出发，运用劳动价值理论，分析资本主义生产、交换、分配过程，揭示剩余价值的秘密，阐明了无产阶级受剥削、受压迫的经济根源。正如列宁所说：“只有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才阐明了无产阶级在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真正地位。”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鲜明地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不断丰富和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他指出：“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我们要随时随刻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并且强调“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这一系列论述延续了我们党一脉相承的政治主张，同时也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确定了主线。

2、“新发展理念”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总引领，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理论框架

新发展理念是习近平总书记根据我国经济发展实践总结提炼出的规律性成果，是将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在讲到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时，他特别强调要贯彻新发展理念。

新发展理念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其中创新发展是动力；协调发展是原则；绿色发展是方式；开放发展是路径；共享发展是目的。如果把发展经济比作做蛋糕，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创新发展是解决怎样将蛋糕做大；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是怎样把蛋糕做好；而共享发展是解决怎样分蛋糕的问题。从理论构建的角度看，新发展理念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理论框架。

关于创新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但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经济规模大而不强，经济增速快而不优，经济发展主要依靠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拉动，然而这种传统的发展方式已经不可持续，必须转向创新发展。如何实施创新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科技创新与体制创新“两个轮子一起转”的思想，既要通过体制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又要通过科技创新带动体制创新。

关于协调发展。过去很长一个时期，我们认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以后，经济就能克服生产的盲目状态，可以实行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既不会出现生产过剩，也不会出现供给短缺。可是实践证明，我们社会主义经济仍然存在发展不协调的问题。改革开放前，经济不协调主要表现为供给短缺；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又出现新的不协调，主要表现是供给过剩与需求不足，而更突出的是结构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着力提高发展的协调性和平衡性”。

关于绿色发展。早在 150 多年前马克思就曾发出警告，要解决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人类要“一天天地学会更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习常过程所做的干预所引起的较近或较远的后果”。众所周知，欧美国家曾走过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面临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走欧美国家的老路肯定行不通。有鉴于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并强调“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关于开放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这一论断，是基于对我国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反思。我国古代对外贸易的繁荣促进了经济的繁荣，而到了明末清初，中国开始“闭关锁国”，经济也就渐渐落后了。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 1978 年开始改革开放，到 2010 年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实践证明，以开放促发展是我们取得成功的基本经验。

关于共享发展。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共享发展既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最终体现。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曾经讲：“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正是为了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持共享发展，就是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3、“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明确了政府与市场的作用边界，为研究资源配置确立了基本范式

关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曾形象地将其比喻为“两只手”。他认为增加国民财富的关键是发挥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只能履行“守夜人”的职责，主要是维护市场自由竞争。马歇尔在 1890 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中虽然指出市场有可能在某一时间偏离均衡状态，但同时又说价格机制会让经济恢复均衡，无需政府干预。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国际上围绕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展开了一场大论战。1908 年意大利经济学家巴罗内论证了全部经济资源归公共所有、整个经济由国家生产部集中管理的合理性。俄国十月革命后，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于 1920 年发表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计算》一文，指出中央计划无法确定某种产品最终是否符合需求，也无法计算某种产品在生产过程中所耗费的劳动和原材料，因此企业的经营活动不可能合乎经济原则。米塞斯的观点，得到了哈耶克和罗宾斯等学者的极力推崇。

1936 年，波兰经济学家兰格撰文论证，通过“模拟市场”可以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同一时期，凯恩斯针对 1929—1933 年西方经济大萧条，出版了《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指出单靠市场无法解决失业问题，主张国家干预经济。1949 年，萨缪尔森对新古典和凯恩斯理论进行了综合，得出的结论是：若一国经济未实现充分就业，就适用凯恩斯理论；若已实现充分就业，国家不应对经济进行干预。20 世纪 70 年代西方国家陷入“滞胀”后，又产生了新凯恩斯主义，认为靠价格机制不能实现市场出清，政府应通过经济政策修复市场机制。

从中国的实践看，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学习苏联模式，长期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党开始对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进行探索。党的十二大报告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个提法是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一次重大突破。伴随农村改革的初步成功，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1992 年党的十四大报告又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说明关于市场的地位与作用，我们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从“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习近平总书记解释说，这一改动“虽然只有两字之差，但对市场作用是一个全新的定位”。并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二者是有机统一的，不是相互否定的，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既不能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取代甚至否定政府作用，也不能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取代甚至否定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市场与政府关系的重要思想，对我们研究资源配置有三点启示：

第一，计划与市场都是资源配置的机制，与社会制度无关。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计划与市场都是手段，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

第二，市场并非万能，在有些领域市场可能失灵。正是由于市场会失灵，我们不仅要研究市场运行的一般规律，也要研究市场失灵。我们知道，西方经济学也承认市场失灵，但认为只在三种情况下才会失灵：一是信息不充分或不对称；二是经济活动有外部性；三是在公共品与公共服务领域。除了以上三种情况，市场其实还有一种失灵，那就是市场分配容易导致收入差距过大，形成两极分化，对收入差距过大问题政府应该加以调控。

第三，政府也并非万能，政府管理经济也可能失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不是要更多发挥政府作用，而是要在保证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管好那些市场管不了或管不好的事情”，并强调“发挥政府作用，不是简单下达行政命令，要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用改革激发市场活力，用政策引导市场预期，用规划明确投资方向，用法治规范市场行为”。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思想，实际上明确了政府作用的原则与方法。

4、“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为经济学理论创新贡献了中国智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经过 30 多年经济高速增长之后，我们要将速度从高速转为中高速；结构从中低端转为中高端；动力要从投资、出口拉动转为创新驱动。怎样成功地完成这种转型？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丰富和发展，为未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其核心要义是，中国经济要实现持续健康发展，政府管理经济的重心应从需求侧转向供给侧，要通过改革推动经济结构调整。

过去很长一个时期，我们政府管理经济的着力点是在需求侧。1998 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2008 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主要措施都是扩大内需。可是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不仅是需求不足，更主要的是生产体系与需求结构不匹配。一方面，生产成本上升，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劳动力、土地、能源等要素价格上涨，生态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另一方面，产业升级缓慢，过剩产能累积，需求外溢较为严重，企业效益下降。面对这些问题，仅扩大内需虽能实现总量平衡，但却解决不了结构性问题。问题变了，解决问题的思路当然要变。

从经济学说史追溯，早期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是重视供给管理的。萨伊在 1803 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概论》中就提出“供给可以自动创造需求”的观点，这一观点被后人称为“萨伊定律”。可是 1929—1933 年西方国家发生了“经济大萧条”后，“萨伊定律”不攻自破。1936 年，凯恩斯在《通论》中用所谓“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收益递减和流动性偏好”三大心理规律，论证了经济大萧条的原因是由于社会有效需求不足，于是提出政府要干预经济，主张通过刺激投资和消费扩大需求。从此，政府管理经济的重心就从供给侧转向了需求侧。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想，显然不同于凯恩斯理论，也不同于西方供给学

派，更不是对“萨伊定律”的回归，而是基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实践，综合研判全球经济大势和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作出的符合中国国情、可以保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中国方案。这一方案，对世界上其他国家解决结构性问题也有借鉴价值。

全面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想，要抓住三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是“改革”。党的十八大召开后，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四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讲：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质是一场改革，要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习近平总书记这里讲的改革，强调的是改革资源配置的体制机制。具体讲：就是要通过改革要素市场体制化解产能过剩；改革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引导资源优化配置；改革行政审批体制与财税体制降低企业制度性成本；改革金融体制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改革投融资体制扩大有效投资补短板。

第二个关键词是“供给侧”。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显然，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在供给侧，所以改革必须从供给侧发力。首先要从生产端优化生产要素的配置，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从体制机制上解决供需错位问题。同时，还要优化现有产品和服务功能，提升供给质量，并通过培育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提供新的产品和服务，创造新的供给，以此创造和引导新的需求。

第三个关键词是“结构”。解决结构失衡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要达到的目的。结构性改革的近期任务，是“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不仅是为了调整供求关系、缓解工业品价格下行压力，而且也是为了去杠杆、防范金融风险。而降成本、补短板，则是为了提高企业竞争力、改善企业发展的外部条件、增强经济增长能力。结构性改革的长期目标，是建立供给结构适应需求结构变化的体制机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稳定经济增长的治本良药，因此“现阶段推出的短期调控手段，也要注意同改革目标一致起来，推动形成完善的体制机制”。

（《光明日报》2018年1月9日）

从《资本论》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探源

董瑞华

党的十九大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一起，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行动指南，实现了我们党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人类已有的经济思想材料进行广泛的吸收和改造，对现实社会经济关系不断进行探索，实现了经济学科学革命，并且在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经济学理论及其科学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在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积累经济建设的宝贵经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本文从探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理论渊源，阐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从而阐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与时俱进的科学。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立与发展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一样，贯穿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一脉相承的科学思想体系。为了深入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经济思想，我们必须简单回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立、产生和发展的过程。

马克思在大学里学的是法学，以后致力于哲学和历史的研究。大学毕业后不久，在担任《莱茵报》主编时，遇到了要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问题。当时，由于他对政治经济学没有研究，还无力对现实的社会经济关系做出更深刻的剖析。这就成为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最初的动因。

从1843年开始，马克思在巴黎阅读了大量的政治经济学文献，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写了7本经济学笔记，并完成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本手稿是马克思建立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尝试。1845年初，马克思移居布鲁塞尔，进一步研读有关政治经济学的文献，这个时期，马克思写的一系列著作都涉及或专门阐述政治经济学理论问题。到欧洲革命前，已经取得了初步但又十分重要的成果。在他创立的唯物史观的基础上，他确立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对商品、货币范畴做了初步的论述；初步分析了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利润和工资范畴。直至1849年8月，移居伦敦后，马克思才开始在当时资本主义经济最发达、最典型的国家重新研究政治经济学。

从 1850 年到 1855 年，马克思在伦敦研读了大量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资料和文献，写出了 24 本读书笔记，即《伦敦笔记》。在英国严重的经济危机来临之前，他写下了一系列的经济学手稿，即《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在政治经济学领域进行了一场伟大的革命。这些手稿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方法，理论体系的结构都做了详尽的阐述，科学论述了劳动价值论、货币理论、剩余价值论以及资本主义运动的规律性问题，标志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基本形成，1859 年，马克思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出版后，到 1863 年，马克思完成了包括 23 个笔记本的内容十分丰富的手稿，进一步完善了劳动价值论，详尽地论述了剩余价值论，阐明了资本主义运动的必然趋势，他决定以《资本论》为标题出版他的著作。

1863 年到 1865 年，马克思以《资本论》为标题，撰写了有关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资本主义流通过程和资本主义总过程等一系列手稿，为《资本论》各卷的陆续出版奠定了基础。1867 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这是马克思长期参加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掌握大量的实际资料和思想材料，批判地吸收和发展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创作的一部划时代的巨著。《资本论》出版之后，马克思继续为第一卷的修订与翻译付出了艰巨的劳动，他花费了三年时间（1871—1873 年）分九个分册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不仅在篇章结构上作了变动，而且在理论上也做了修改。同时他（1872—1875 年）亲自翻译、修订和校改的《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也分册出版。法文版不仅增加了不少新的内容，而且有许多理论问题阐述得更为完善，有独立的科学价值。这一切说明了马克思没有把《资本论》中得出的理论结论看作是不变的终极真理，而是根据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新情况和自己对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新成果来不断丰富和完善自己的理论。

马克思在修订《资本论》第一卷的同时，还为创作《资本论》第二、三卷进行了辛勤的劳动，他写作了有关《资本论》第二卷的 7 个手稿，还就《资本论》第三卷的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等理论问题做了专门的研究。但是，马克思在他的有生之年，并没有完成《资本论》第二、三卷的出版，因为马克思在加工、修订过程中，搜集、研究了大量俄国、美国、英国、法国的新材料，他认为，只要这些国家的官方调查还没有结束，这些调查材料还没有公布，他对《资本论》的最后加工就不可能完成。他的严肃的科学态度，对资本主义经济发生的新情况的崭新思考和更加深入、广泛的研究是他没有完成写作的重要原因。

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自由市场经济在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占统治地位。在此后的二、三十年中，开始向现代市场经济过渡，资本主义也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早在五、六十年代，马克思就注意到了信用和股份资本的出现及其给资本主义经济带来的重大影响。他多次论述了证券交易所、动产信用公司等新型金融企业，认为大股份银行是当代最不寻常的经济现象之一。他在《资本论》最初手稿中就把“资本作为信用”“资本作为股份资本”“资本作为货币市场”列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在六十年代，他在《资本论》第三卷手稿中进一步论述了股份资本的形成、作用与其意义。认为股份资本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同资本所有权分离，因而劳动也已经完全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须的过渡点。到了八、九十年代，恩格斯在整理出版《资本论》第三卷时，根据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情况，对马克思的手稿作了重要的补充，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已经从自由竞争转变为垄断。并且写了《交易所》的提纲，研究了交易所的地位和新作用等。总之，恩格斯在晚年已经对垄断资本主义的一些最重要的经济现象作了深刻的揭露和科学的分析，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理论观点，为列宁创立帝国主义理论打下了理论基础。恩格斯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基人之一，他在每个时期，都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和发展做出了自己的巨大贡献。

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不断发展的科学。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

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提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力量，在于它对现存社会的经济关系及其历史趋势提供正确的认识，而不在于它能够提出什么千古不变的“真理”。

二、十九世纪末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十九世纪末是资本主义时代发生大转折的时期，这种转折是由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引起的。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过渡到垄断阶段。对于社会经济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第二国际的理论家霍布森、卢森堡、希法亭、拉法格等纷纷进行研究和探索，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有的得出了错误的结论，有的则为帝国主义理论的研究做出了贡献。列宁在批判地吸收第二国际理论家们对帝国主义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深入地研究资本主义时代的新变化，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列宁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撰写的著作和论文已经得出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的论断，但是还没有做出系统的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促使他加紧这方面的系统研究。他做的《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摘录了 48 本书与刊登在 49 种刊物上的 230 篇论文。在充分占有大量实际资料和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列宁对资本主义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新变化做了科学的分析，并进行了深刻的理论思考。写出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来揭示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实质，科学地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竞争和垄断的理论、股份公司的理论、资本积累理论和资本过剩理论，运用他们在这些理论中的分析方法进行创作，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他对时代发生新变化的分析有以下方面：

首先，分析了垄断的产生与发展。垄断成为帝国主义最深厚的经济基础。

其次，分析了金融资本的形成和统治。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的统治，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再次，分析了资本输出的特殊意义。资本输出给垄断资本家带来了惊人的利润，使金融资本的密网遍布全世界，成为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和国家的坚实基础。

最后，分析了时代新变化的基本趋势。他认为，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在生产和技术方面会导致两种趋势：一方面是帝国主义生产和技术停滞的趋势。另一方面是帝国主义生产和技术可能发展，有时还会发展很快的趋势。这两种趋势会交替出现。决定了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就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开始。

列宁在研究帝国主义问题的同时，还研究了殖民地和民族解放运动问题，他把民族问题和帝国主义时代的殖民地问题联系起来，详尽地考察和阐述了殖民地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丰富了帝国主义理论。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在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科学地分析了俄国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的实际，研究了经济落后国家如何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对新经济政策实施过程中如何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形式过渡到社会主义，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的作用发展经济，运用合作社形式引导农民向社会主义过渡等问题，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进行了探索，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十月革命胜利之后，苏联的伟大实践和苏联学者在理论上的探索，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列宁的研究和实践虽然推动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立，但是不可能进行系统的研究和阐述。因此，斯大林系统地总结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

际经验，创作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在这本著作中，他科学地阐述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如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问题、经济规律性质和社会主义经济规律问题、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与达到目的的手段问题等。斯大林的理论探索虽然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但是应该承认，他的理论研究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三、四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的理论成果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取得政权以后，就积极探索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依据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所创造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政治条件，采取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社会主义改造包括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即把它们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进行的创新。并且实行逐步改造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具体政策，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中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艰难任务。

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通过经济建设的实践，毛泽东不断总结经验，把认识上升到理论，写作了《论十大关系》，在这部著作中，他提出，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就必须处理好各种关系，要以农业为基础，正确处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充分重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他指出，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要处理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汉族和少数民族，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自力更生和学习外国，不要机械地搬用外国的经验等各种关系，要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注意综合平衡等理论。在其他著作中，他还提出工人是企业的主人，要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和技术人员、工人、干部“三结合”等理论，这一系列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贡献。

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在领导经济建设时，逐步制定了处理经济关系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经济建设的方针，包括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以农业为基础，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建设规模要与国力相适应，积极稳妥地规定经济发展速度，合理布局、重点建设与全面安排相结合，要建设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要正确认识经济发展中平衡与不平衡的关系，坚持综合平衡，坚持财政、信贷、物资三大平衡，经济建设与人民生活兼顾，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等一系列正确方针。指导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从实践上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 50—60 年代积极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道路，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成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努力总结以前的经验教训，继续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道路，经过集体的艰苦努力，开创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道路，建立了邓小平经济发展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首先，明确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他指出，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的一条是发展生产力，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他指出改革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改革是发展生产力的动力，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其次，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邓小平在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时，进行了深刻的理论思考，他剖析了市场经济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依附关系，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剥离出市场经济这一体制性的规定，从而得出了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的结论。从而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我们开辟了一条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新道路。

再次，阐述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邓小平十分重视经济发展战略，设计了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宏伟战略计划，指明了中国在初级阶段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同时，他还阐述了实现战略步骤的方法论。

最后，阐明了其他一系列的经济理论。包括“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理论、“对外开放”理论、“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理论、“先富带动后富”理论、“艰苦创业”理论、“科教兴国”理论、“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理论等。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创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创立了指导中国经济建设的经济理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仅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而且继承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在经济理论上大胆探索，不断创新，在理论上获得丰硕的成果。

第一，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提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发展要善于抓住机遇，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第二，确定我们的奋斗目标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个思想符合我国国情和人民的愿望，丰富了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

第三，明确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这个根本任务就是不断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在促进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要促使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不断完善，使之体现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为生产力的不断解放和发展开拓更广阔的通途。

第四，第一次系统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理论。即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从基本理论上回答了如何把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

第五，创立了社会主义所有制实现形式理论。对公有制的性质和实现形式作了科学的区分。

第六，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坚持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要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

第七，阐明必须加快政府经济职能的转变。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其政府除了其政治职能以外，还具有领导和管理经济的职能，

第八，制定和实施对外开放战略。对外开放是我国的长期国策，有利于促进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增强我国经济发展活力和国际竞争力。

第九，强调我国的科技进步和创新的重要意义。江泽民指出，历史反复证明，推进科技发展，关键要敢于和善于创新。有没有创新能力，能不能进行创新，是当今世界范围内经济和科技竞争的决定性因素。

在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上，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分析国际国内形势，从我国新世纪实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部署，在头 20 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任务出发，明确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是：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具体有以下方面。

第一，以人为本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十分丰富，但是，首先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¹科学发展观辩证地阐明了人的全面发展与经济、文化发展的关系。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科学地

阐明了经济、文化发展与人的发展的辩证统一关系。人的发展离不开经济发展，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为人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同时，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提高和不断完善的过程。我们只有经过不懈努力与实践，才能最终实现这个目标。社会主义已经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这些条件来促进人的发展，同时通过促进人的发展这个任务来调动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从而推动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只有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才能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第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科学发展观的基础。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只有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能为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因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在一个重要关口，工作搞得好，就能够把来之不易的好形势巩固和发展下去。

第三，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的内容非常丰富。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角度看，全面就是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的各个领域，有关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各个方面，这些都建立在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础上，通过经济发展，来促进社会、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与社会全面进步。协调就是要努力做到：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促进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促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协调；促进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的协调。可持续就是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使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人口各方面的协调，坚持经济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使子子孙孙永续良好发展下去。所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经济、社会、和人口、资源、环境的统一，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的统一，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

第四，改革开放是科学发展的动力。在我们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中，还存在着一些深层次的矛盾，这些矛盾只有通过深化改革才能逐步解决。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出：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加快的国际环境，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必须加快推进改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注入强大动力。我们党的新一代领导集体，这样完整地提出科学发展观，是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发展，也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新发展，科学发展观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而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四、十八大以来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趋势，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和新特征的经济思想，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中国经济发展经验的科学结合，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用掌握的科学的经济学方法论，认识经济运动过程，把握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更好地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提高领导我国经济发展能力和水平，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主要有以下内容。

第一，形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体系。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学习和理论建设。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举世瞩目，而当前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的发展又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这就为理论创新拓展了巨大空间和蕴酿了蓬勃的活力。十八

大以来，习近平坚持和继承，并且通过不断的实践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初步建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基本体系。

第二，关于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科学判断。十八大以来，无论是对世界经济还是中国经济而言，都可以说是错综复杂的。环顾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审视国内，下行压力增大。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国内经济持续下行的压力，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深刻洞察国内外大势，准确把握经济发展大局。以经济工作的“新思维”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经济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指明了方向。

2013年12月10日，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首次提出“新常态”：我们注重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各类问题，既防范增长速度滑出底线，又理性对待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2014年5月10日，习近平同志在河南考察时的讲话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对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探索，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各界一直高度关注的重大问题。对于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认识，要正确处理好勇于改革、勇于创新 and 稳妥审慎、稳中求进的辩证关系。新常态不是一个事件，不能用好或坏来判断；新常态不是一个筐子，不能什么都往里面装；新常态不是一个避风港，不要把不好做或难做的工作都归结于新常态。新常态呈现新趋势，经济增速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

第三，关于以人民为中心，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复杂的国内外形势，面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新机遇和新矛盾新挑战，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根据国内外的实际，鲜明地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符合我国国情，顺应时代要求，在理论和实践上有新的突破，对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具有重大指导意义，更有利于实践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新发展理念中，创新发展解决发展动力不足问题，协调发展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绿色发展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开放发展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共享发展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

第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思想。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说明我国已经进入建设现代化的新时代，新时代对我们提出了许多新要求。提出经济现代化是我国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个转变需要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通过这三方面的变化，才能逐步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来源于我们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追求。十九大报告提出了重大的战略目标，从2020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到2020年，我们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目标的达到没有一个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支撑是不可能的。

第五，关于建设科技创新国家的思想。要实现中国梦，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关键在于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建设科技创新大国。习近平指出：“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自古以来，科学技术就以一种不可逆转、不可抗拒的力量推动着人类社会向前发展。16世纪以来，世界发生了多次科技革命，每一次都深刻影响了世界力量格局。从某种意义上说，科技实力决定着世界政治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也决定着各国各民族的前途命运。”进一步阐明了科学技术的

重大作用和建设科技创新大国的重要意义。

习近平明确指出：“当前，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团结奋斗。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强大的科技创新力量。党的十八大做出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大部署，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这是党中央综合分析国内外大势、立足我国发展全局做出的重大战略抉择。”^[9]阐明了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马克思科学技术思想的继承和对建设科技创新大国的新布局。

第六，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方法，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习近平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的基础上，提出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要运用统筹兼顾的具体方法协调各方面的发展，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

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生态环境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是对生产力理论的重大发展，包含尊重自然、谋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价值理念和发展理念。

（二）处理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关系

习近平提出，在经济发展和深化改革中，要坚持正确的思想方法，坚持辩证法，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规律。提出要把握和处理好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些重大关系。

一是处理好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在新的时代实践中，需要新的思想引领，仍然需要以解放思想为先导。不进行思想的大解放，就不会有改革的大突破。解放思想的目的在于更好地实事求是。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有机统一。

二是处理好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全面深化改革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部署，是一个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的复杂系统工程。要坚持整体推进，统筹谋划各项改革相互促进、良性互动、协同配合，注重改革措施整体效果。但整体推进又不是平均用力、齐头并进，而是要注重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注重抓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

三是处理好全局和局部的关系。局部与全局相互依存，没有局部就无所谓全局，没有全局局部也不可能存在，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每一项改革既要考虑局部的具体情况，更要从大局出发，从全局上来统筹谋划。

四是处理好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回顾我国改革开放的历程，摸着石头过河是富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实践论的方法。同时，随着改革不断推进，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是辩证统一的。

五是处理好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的关系。习近平强调：“我们一定要坚持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战略上要勇于进取，战术上则要稳扎稳打。”对一些重大改革，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可以提出总体思路和方案，但推行起来还是要稳扎稳打，积小胜为大胜。

六是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改革发展稳定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三个重要支点。改革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发展是解决一切经济社会问题的关键，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

第七，关于市场与政府关系的思想。习近平总结了国内外的理论和实践经验，逐步形成他的关于正确处理市场与政府关系的思想。首先必须坚持我国的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我们党确立的一项大政方针。为了解决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长期没有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我们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这是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

在谈到市场和政府关系时，习近平多次指出，要讲辩证法、两点论，把“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用好。政府和市场的作用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也不是简单的让市场作用多一些、政府作用少一些的问题，而是统筹把握、优势互补、有机结合、协同发力。要划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凡属市场能发挥作用的，政府要简政放权，要松绑支持，不要去干预；凡属市场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政府应当主动补位，该管的要坚决管，管到位，管出水平，避免出问题。要善于运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只告诉市场主体不能做什么，至于能做什么、该做什么，由市场主体根据市场变化做出判断。要找准市场功能和政府行为的最佳结合点，切实把市场和政府的优势都充分发挥出来，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特色和优势，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

第八，关于全面开放的思想。2013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我们要坚持从我国实际出发，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同时我们要树立世界眼光，更好地把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统一起来，把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联系起来，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我们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确立开放的自主性，关系到我国的正当利益，也决定着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前途和命运。

为此，必须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局面。要以扎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为抓手。进一步推进贸易强国建设；进一步改善外商投资环境；进一步优化区域开放布局；进一步加大西部开放力度；要赋予自贸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深入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进一步创新对外投资合作方式；更加努力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第九，关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具体来讲，要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此我们需要支持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瞄准国际标准提高水平；继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坚持“三去一降一补”；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

第十，关于生态文明的思想。在提到发展经济时，特别指出要注意生态环境保护。中共中央政治局2013年5月24日上午就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进行第六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要清醒认识保护生态环境、治理环境污染的紧迫性和艰巨性，清醒认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对人民群众、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态度和责任，真正下决心把环境污染治理好、把生态环境建设好，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习近平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绝不是对立的，关键在人，关键在思路。

第十一，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思想。在十九大报告中，首度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期做好“三农”工作的重要遵循。解决好“三农”问题一直以来都是我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乡村振兴战略就是我们要实施的七大战略之一，这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这是党中央对“三农”工作做出的一个新的战略部署、提出的一个新的要求，意义非常

重大，亿万农民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充满期待。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就是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努力做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是农业农村发展到新阶段的必然要求。乡村从来不是处在从属的地位上，在现代化进程中，它应该和城市处在平等的地位上。农民是乡村振兴的主体，农民是乡村振兴的受益者，所以必须要把亿万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调动起来。在党的十九大报告里提出的五个方面，都要进一步明确任务，都要进行相应的制度创新，把每一项工作做实了，让乡村振兴战略能够落地、能够生根，能够给亿万农民带来好处、带来利益、带来福祉，能让农村的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根据以上的阐述和分析，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相结合，产生和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过程，正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上努力实践与探索的过程，从实践和探索的四个阶段中我们可以看到以下方面。

首先，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各个阶段的理论成果，尤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都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反映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科学原理。例如：从为人民服务到以人为本，从主要任务是经济建设到经济建设为中心，都要促进生产力发展，在经济建设中都要求统筹兼顾协调发展，当前的目标都是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等等，所以这些理论成果是一脉相承的。

其次，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各个阶段国内外形势都有不同的特点，各个阶段都有不同的发展任务，也有不同的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和问题。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科学。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提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再三强调：“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所以，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科学性和强大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我们要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在不断发展的，是与时俱进的。尤其是我们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我们的理论指南。

综上所述，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到马克思主义在苏联、中国的丰富和发展，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是对人类已有的思想材料进行广泛的吸收和改造，对现实社会经济关系不断进行探索，来实现科学理论革命的，并且在实践中得到不断的丰富和发展，从马克思主义的创立与发展的历程，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科学。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而产生和发展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

（《上海商学院学报》2017年第6期）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丰富内涵及指导意义

周跃辉

2017年12月20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5年来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是党和国家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必须长期坚持、不断丰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们有力有序做好2018年的经济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方向指南。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特征

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首要的问题是要弄清楚这一思想具有什么样的特征。整体上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经济工作中“观大势、谋全局、干实事”的实践而来。概括起来讲,这一思想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强调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历史经验表明,共产党不仅能够打天下,也能够治天下。党领导了新中国的经济建设,特别是领导了30多年改革开放,取得了震惊世界的“中国奇迹”。当前,在“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下,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是我们夺取政权和加快发展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党同志维护中央权威,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重大经济决策部署上来,“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的关系,正确对待利益格局调整,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坚决维护中央权威,保证政令畅通,坚定不移实现中央改革决策部署。”同时,他还强调,必须“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党领导经济工作的观念、体制、方式方法也要与时俱进;要加强党领导经济工作制度化建设,提高党领导经济工作法治化水平,增强党领导经济工作专业化能力,强化舆论引导工作。

体现出对经济规律的充分尊重。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指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法治的市场经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市场决定论”的提出,体现了其尊重经济规律,注重运用规律的突出特点,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又坚定向前迈了一大步。习近平总书记认为,我国经济正在向

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他提出，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是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这是我国经济发展必须遵循的三个规律。这一概括，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市场经济规律的充分尊重。

具备宽阔的国际视野。2017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指出：“要在开放的范围和层次上进一步拓展，更要在开放的思想观念、结构布局、体制机制上进一步拓展。”当前，世界正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各国面临的发展问题十分严峻。习近平总书记以宽阔的国际视野，紧紧围绕和平发展战略思想和外交策略方针，成功开展了一系列重大经济外交活动，就促进世界经济增长、推动区域合作、完善全球经济治理等阐述主张，引发国际舆论高度关注。从提出坚持正确义利观到完善全球治理机制，再到倡议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等等，其经济思想都具备宽阔的国际视野。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做好经济外交工作，要突出发挥比较优势这个重点，善于在国际竞争中扬长补短。习近平总书记广泛参与了一系列国际重要经济会议，广泛与世界各国深入交往，既体现出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更加主动自信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良好形象，也展现了其经济思想的广阔视野。

具备以人民为中心的理论特质。“天下顺治在民富，天下和静在民乐。”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后的首次公开讲话中就鲜明宣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地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一定要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夙夜在公，勤勉工作，努力向历史、向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必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中央领导是人民的大勤务员”，“让人民共享人生出彩机会”。习近平总书记曾在陕北下乡七年，进入政界后也在贫困地区工作多年。他了解群众疾苦，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始终关心粮食安全问题，提出“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始终关心耕地保护，提出“要像保护大熊猫那样来保护耕地”，强调“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必须坚持有质量有效益的发展，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为人民群众生活改善打下更为雄厚的基础”等等。可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鲜明的为民情怀。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框架

2017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用“七个坚持”来概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内容：“我们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保证我国经济沿着正确方向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中；坚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立足大局，把握规律；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坚决扫除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坚持适应我国经济发展主要矛盾变化完善宏观调控，相机抉择，开准药方，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坚持问题导向部署经济发展新战略，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变革产生深远影响；坚持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稳中求进，保持战略定力、坚持底线思维，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迈进。”并强调“必须长期坚持、不断丰富发展”。从整体上看，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理解该思想的基本框架。

形成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的体制机制。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指导下，不断加强和完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工作的体制机制，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开展工作，党领导经济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党中央每个季度都要分析研究经济形势，并定期研究部署重大战略问题，这一机制对推动我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比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完善宏观调控、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等重大政策措施的推出，显著地改善和提高了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作用。此外，各地区党委亦不断加强对于地方重大经济问题的研究和决策，有力地推动了区域经济发展。

形成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的经济政策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明确提出，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五大发展理念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坚持创新发展，就是要更加注重解决发展动力问题，推动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坚持协调发展，就是要更加注重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着力增强发展的整体性；坚持绿色发展，就是要更加注重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坚持开放发展，就是要注重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进一步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坚持共享发展，就是要注重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不断增进人民福祉。

形成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经济发展思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我国经济发展思路的重大调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导致经济循环不畅，必须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想办法，努力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就是要深入研究市场变化，理解现实需求和潜在需求，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中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就是要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着力提升整个供给体系质量，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就是要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体制机制，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打破垄断，健全要素市场，使价格机制真正引导资源配置。

形成稳中求进经济工作方法论。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要长期坚持。‘稳’和‘进’是辩证统一的，要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把握好工作节奏和力度。要统筹各项政策，加强政策协同。”在要求“稳”的同时，并不放松对“进”的要求，要求改革开放要加大力度，在经济体制改革上步子再快一些，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推进基础性关键领域改革取得新的突破，扩大对外开放，大幅放宽市场准入，加快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结构性政策要发挥更大作用，强化实体经济吸引力和竞争力，优化存量资源配置，强化创新驱动，发挥好消费的基础性作用，促进有效投资特别是民间投资合理增长；社会政策要注重解决突出民生问题，积极主动回应群众关切，加强基本公共服务，加强基本民生保障，及时化解社会矛盾。同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强调，抓好经济工作要坚持问题导向部署经济发展新战略，保持战略定力、坚持底线思维，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迈进。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中国经济实践

理论的最终目的是要用来指导实践。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基本特征就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高质量发展,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是遵循经济规律发展的必然要求。”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做好推动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这篇大文章,是贯彻落实这一思想的最好途径。我们要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8项重点工作。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继续强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经济发展中的主线作用,我们要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要求,要推进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重点在“破”“立”“降”上下功夫。大力破除无效供给,把处置“僵尸企业”作为重要抓手,推动化解过剩产能;大力培育新动能,强化科技创新,推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培育一批具有创新能力的排头兵企业,积极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大力降低实体经济成本,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继续清理涉企收费,加大对乱收费的查处和整治力度,深化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等行业改革,降低用能、物流成本。

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发展,最终要靠各类市场主体。我们要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要求,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完善国企国资改革方案,围绕管资本为主加快转变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职能,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加强国有企业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支持民营企业发展,落实保护产权政策,依法甄别纠正社会反映强烈的产权纠纷案件;全面实施并不断完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破除歧视性限制和各种隐性障碍。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农业发展、农民富裕是实现高质量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方面。无论处于什么样的发展阶段,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始终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不断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始终把“三农”工作牢牢抓住、紧紧抓好。我们要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要求,科学制定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清除阻碍要素下乡的各种障碍;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农业政策从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深化粮食收储制度改革,让收储价格更好反映市场供求,扩大轮作休耕制度试点。

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我们要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要求,要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比较均衡,人民生活水平大体相当;京津冀协同发展要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重点,高起点、高质量编制好雄安新区规划;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要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引领;要围绕“一带一路”建设,创新对外投资方式,以投资带动贸易发展、产业发展。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改善生产生活条件;推进西部大开发,加快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推动中部地区崛起,支持东部地区率先推动高质量发展;科学规划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高城市群质量,推进大中小城市网络化建设,增强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吸引力和

承载力,加快户籍制度改革落地步伐;引导特色小镇健康发展。

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没有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体系,高质量的经济发展也就无从谈起。我们要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既要在开放的范围和层次上进一步拓展,更要在开放的思想观念、结构布局、体制机制上进一步拓展;有序放宽市场准入,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继续精简负面清单,抓紧完善外资相关法律,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促进贸易平衡,更加注重提升出口质量和附加值,积极扩大进口,下调部分产品进口关税;大力发展服务贸易;继续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试点;有效引导支持对外投资。

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立场。我们要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针对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精准施策,着力解决中小学生学习负担重、“择校热”、“大班额”等突出问题,解决好婴幼儿照护和儿童早期教育服务问题;注重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解决好性别歧视、身份歧视问题;改革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加快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继续解决好“看病难、看病贵”问题,鼓励社会资金进入养老、医疗等领域;着力解决网上虚假信息诈骗、倒卖个人信息等突出问题;做好民生工作,要突出问题导向,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找准突出问题及其症结所在,周密谋划、用心操作。

加快建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实现高质量的经济的发展,必须要有稳定而健康的房地产市场。我们要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特别是长期租赁,保护租赁利益相关方合法权益;完善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保持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分清中央和地方事权,实行差别化调控。

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高质量的经济的发展,最终要使人民享受到山清水秀天蓝地绿的美好环境。只有恢复绿水青山,才能使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我们要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实施好“十三五”规划确定的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启动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引导国企、民企、外企、集体、个人、社会组织等各方面资金投入;深入实施“水十条”,全面实施“土十条”;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研究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

(《前线》2018年第1期)

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思想研究

纪志耿 祝林林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总结历史经验以及把准时代脉搏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思想。这一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民大众立场的坚持与发展，是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我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以及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总结与借鉴，是对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现实问题的回应。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的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的思想作为习近平治国理政的核心思想，贯穿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理念之中。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思想更是作为核心之首，起着“掌舵”的作用。它进一步回答了我国经济发展“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坚定了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方向。

一、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思想的产生基础

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思想不是凭空而来的，是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产生的；是在总结国内、国外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产生的；是在深刻剖析国内现实情况的基础上形成、产生的，具有理论基础、历史经验以及现实依据相统一的逻辑关系。

（一）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

思想的产生必须立足已有的理论，才能站得高。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最新成果之一，自然其理论基础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理论的继承。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生产力包括物的生产力与人本身，作为生产力的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积极的因素。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思想就是要发挥人民促进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作用，实现生产的发展与人的发展相协调。尽管经过改革开放近 40 年的发展，我国的生产力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也日益突出，尤其是发展的不协调成为当前制约我国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关键矛盾。因此，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思想有利于协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力量的唯物史观的继承。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思想就是坚持人民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历史的英雄。”目前我国经济的发展面临新的挑战，世界经济发展不景气，国内资源与环境的双重制约，更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思想，发挥人民的首创精神，凝聚人民

力量，推动我国经济在平稳中持续增长。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思想是落实共同富裕观和共享发展理念的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思想就是要坚持经济发展为了人民，经济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习近平指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当前我国仍然存在一部分人口处于温饱线边缘、环境问题依然突出等民生问题，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思想就是对人民向往有更好生活期盼的回应。

（二）历史借鉴：形态不同的社会发展实践

思想的产生必须以史为戒、以史为鉴，才能想得远。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思想是习近平对苏联历史、我国革命与建设历史的经验借鉴与总结。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克思、恩格斯笔下的社会主义在俄国得到了实现；但1991年，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老大哥”顷刻崩塌。对于苏联解体的原因，学术界有众多的观点，但最能达成一致意见还是苏联的发展脱离了人民，尽管苏联在短短的70多年中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据现有史料显示：“1913年，旧俄国工业还不到世界的3%，1985年已达到20%”。习近平提出，在学习苏联的历史，总结苏联的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在我国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要始终牢牢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性，使我国经济在人民的耕耘中健康成长。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思想不仅以苏联为戒，而且也以我国革命和建设历史为鉴。革命战争年代，为了推翻压在我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中国共产党从中国人民的现实利益出发，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等一系列以人民群众为中心的经济实践；到了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调动了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中国共产党围绕解决人民在不同时期的需求问题，一方面大力发展生产力，另一方面积极调整生产关系，满足人民的需求。习近平的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思想正是对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人民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思想也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唯资本论的发展模式的摒弃。资本主义的出现，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正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资本主义在创造极大生产力的同时也蕴含了经济危机，这种危机的实质是生产的相对过剩的危机，人民创造财富，却不拥有财富。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思想，正是在吸取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重视资本的发展而忽视人的发展教训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

（三）现实依据：经济发展的新问题

思想的产生必须立足时代和实践，才能看得宽。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思想之源，问题是思想产生的起点和契机。习近平的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思想正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伟大时代的产物，是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践中产生并发展，是对现实经济发展过程所遇到的问题开出的“药方”。新目标需要新思想。目前我国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要实现的全面小康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小康，更强调是“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的小康，是覆盖领域与覆盖人口全面的小康。习近平的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思想正是以实现“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为目标的新理论。新常态呼唤新动力。经过改革开放近40年的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解放与发展，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但目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三期叠加”的压力。在新常态下需要新的发展动力来破解“马太效应”等问题，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思想是新常态下形成新动力的聚心力。目前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长征路上，我国不仅面临“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的挑战，同时也面临“发展成果创造、获取和分配等历时态问题的共时态解决”的困境，这需要在新的长征路上进一步厘清资本与人民的关系以及进一步回答发展为了谁和依靠谁的问题。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思想是立足我国的现实情况，总结实践经验，回答实践中出现的亟需解决的

问题，并“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的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

二、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但它“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于思想的环节”，而应是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的具体内容。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有：国有企业改革，夯实全体人民共享的经济基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满足人民的有效需求；土地“三权”分置，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精准扶贫，补齐全面小康短板；“四化”同步发展，提升人民获得感。

（一）国有企业改革：夯实全体人民共享的经济基础

做大“蛋糕”是实现全体人民共享“蛋糕”的前提。全体人民要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必须占有和支配生产资料，公有制经济是全体人民占有生产资料的经济，是实现全体人民共享的经济基础，只有不断壮大国有经济，实现其保值、增值，才能真正实现全体人民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为此，习近平在多种场合强调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夯实全体人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基础。一是坚持问题导向，将国有企业打造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国有企业经过多年的改革，总体上实现了与市场经济的融合发展。但国有企业仍然面临一些挑战、存在一些弊端，需要进一步推进改革。推行“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特许经营、政府监管”的改革，进一步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实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目标，提高国有经济的竞争力，放大国有资本的功能。二是坚持底线思维，保证国有企业改革的正确方向。习近平多次强调“我们的改革开放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我们的国企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不能把国有企业改成其他主义企业，不能改成追求利润的工具。习近平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底线思维，既“保证了国有企业不改变国有性质，又防止了国资流失”，实现国有企业在改革中“做强、做优、做大”，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力”。国有企业在实现全体人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中占有重要地位，习近平曾经用“支柱、命门、实体、力量”等词语来形容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只有不断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壮大国有企业，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满足人民不断升级的有效需求

满足人民的需求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思想的出发点与落脚点。目前“我国不是需求不足，或没有需求，而是需求变了，供给的产品却没有变，质量、服务跟不上”。对此，习近平通过研判国内外经济情况与人民的需求状况，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经济策略，通过深化改革来提高供给的质量，增强供给的有效性，适应人民的消费需求。一是加强对生产端的管理，增加有效供给。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加强对生产端的管理，通过“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从生产领域增加优质供给，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增强供给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与灵活性。二是加强对需求侧的管理，发挥需求的诱导作用。供给与需求作为市场经济内在关系的两个基本方面，二者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没有需求，供给也无法实现，新的需求可以催生新的供给，促使生产结构的调整。因此推进供给侧改革也需要发挥需求侧对供给侧的反作用。三是加强对现有的“结构性”管理。目前出现大量的供给过剩，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生产要素配置的扭曲。因此，必须“通过优化现有的生产要素配置和组合，提高生产要素的利用水平，促进全要素的生产率提高，不断增强经济的内生动力。”通过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通过培育和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提供新的供给；通过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增加有效供给。最终使供给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中高水平供需平衡的飞跃，更好地适应人民

的需求变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三) 土地“三权”分置:构建农民持续增收的长效机制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思想,不仅要通过国有企业改革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物质财富的增长和有效供给的增加,还要让物质财富惠及广大农民群众,让广大农民群众从现有的有效供给中满足自己的需求。推进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把土地的经营权从承包经营权中分离出来,有利于盘活农村资源,拓宽农民的增收渠道,增加农民的收入。一是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必须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是广大农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重要保障,在推进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的实践中,必须“坚持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坚持家庭经营基础性地位、坚持稳定土地承包关系”。二是创新农业经营体系。适应农业生产关系的变化,不断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在实践中根据需要不断创新农村土地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在固守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稳定农户的土地承包权的前提下,放活农民土地经营权,“构建以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合作与联合为纽带、社会化服务为支撑的立体式复合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实现农民稳定增收。三是采用渐进式的改革原则。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涉及各方面的利益主体,必须谨慎稳妥推进,保障人民的粮食安全,维护农民的利益。

(四) 精准扶贫:补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

正如前文所述,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思想中的“人民”是全体人民,是一个都不掉队的“人民”。但是目前农村仍有五千多万贫困人口没有真正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这是我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短板中的短板,因此,必须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打赢脱贫攻坚战,补齐全面小康的短板,让经济发展成果惠及广大农村贫困人口。如何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关键在于“精准”,习近平提出:“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的“六个精准”,成功解决了“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的问题。一是建档立卡,解决好“扶持谁”的问题。精准扶贫的第一步是要找出真正的贫困人口,通过建档立卡摸清贫困人口的致贫原因、贫困程度,进而采取精准帮扶,实现“扶真贫”的目标。二是落实责任,解决好“谁来扶”的问题。“推进脱贫攻坚,关键是责任落实到人。”建立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和县抓落实的扶贫开发工作机制,“做到分工明确、责任清楚、任务到人、考核到位”,实现“真扶贫”的目标。三是开对“药方”,解决好“怎么扶”的问题。在扶贫的实践中,应根据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具体情况,实施“五个一批”工程,实现“真脱贫”的目标。紧紧扭住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开关,实施发展生产脱贫一批;牢牢抓住改善生存条件,实施异地搬迁脱贫一批;牢固树立绿色扶贫的理念,实施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坚持治贫先治愚的方针,实施发展教育脱贫一批;发挥制度优势,实施社会保障兜底脱贫一批。

(五) “四化”同步发展:提升人民获得感

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思想是一个全面的系统,包括通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人民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与产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思想,必须坚持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西方发达国家采用“串联式”方式,推进“四化”的发展,中国想要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为人民提供更加丰富的、更有质量的产品,需要采取“并联式”的方式来推进“四化”的发展,让“四化”在融合中发展。一是通过新型工业化激活潜在经济活力,增强新的经济增长力量,促进经济发展,为人民提供更加丰富的工业产品。二是通过推进信息化发展,完善普及信息化服务,降低信息化服务成本,为老百姓提供“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的信息服务,让全体人民在共享经济发展成果上有更多获得感,让互联网成为全体人民共享经济成果的新载体、新手段。三是通过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让人民真正

融入城市之中，成为城市的主人，而不是城市的仆人。在城镇化的实践中要坚持以人为本、优化布局、生态文明、传承文化的原则，使人民生活在一个有文化、有特色、有质量的环境中。四是通过推进农业现代化，满足人民多样化、高品质的食物需求，让人民的粮食安全紧紧掌握在中国人民自己的手中。坚持推进“四化”同步发展，让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满足感在经济发展的实践中真正得到提升。

三、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思想的基本特征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在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思想，这一思想是特定环境的产物（在实现中华民族由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进程中又面临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也是其个人工作风格的体现（长期基层工作的锻炼而具有的为民精神），特征尤为明显。

（一）一个目的：发展为了人民

坚持经济发展为了人民的根本目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决定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不是资本增值了多少，而是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否提高，是否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要坚持发展的出发点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发展的手段是否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是否提高。坚持经济的发展依靠人民的根本动力。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与理论都有效证明了人民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在经济发展的实践中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并用好人民群众在实践中的首创精神，通过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充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在经济发展的实践中必须相信和依靠群众力量，问计于民并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凝聚力量。坚持经济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根本价值归宿。经济建设是全体人民共同的事业，经济发展的过程也应是全体人民共享成果的过程。全体人民在推进我国经济建设的过程中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那么由此带来的经济发展成果也应全体人民共同享有。

（二）一个导向：强烈的问题导向

人民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是全体人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这是由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决定的。邓小平曾经指出：“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但现实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成了实现共同富裕的绊脚石。为此习近平提出人民为中心的经济思想，实现经济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首先，经济共享的覆盖面是全体人民，这里的全体人民既包括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和欠发达的中部地区的人民，也包括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西部地区的人民。只要是中国人民都有权利和机会在经济建设的过程实现自我价值，在结果中满足自我需求。其次，全体人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是共建共享的过程，这是由目前我国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的。共享是实现每个人按需分配，但目前我国处于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整体生产力水平还处于不发达阶段，要实现按需分配的共享，还需要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共建一个生产力发达、物质丰富的社会。因此，在建设的过程中要构建一个激发民力、人人参与、人人尽力的舞台。最后，全体人民共享经济建设成果是一个渐进共享的过程，这是由事物发展的过程和矛盾的特殊性决定的。我国是一个地域辽阔的国家，每个地方都有独特的自然条件，这决定每个地方的经济发展速度与发展结果，同时事物的发展都是一个由弱到强的过程，因此实现全体人民共享经济成果的目标“必将有一个由低级到高级、从不均衡到均衡的过程”。

四、落实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思想的重要举措

(一) 坚持基本国情，走渐进共享道路

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思想是习近平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中基于对国情、世情的准确把握的基础上形成的，践行这一思想也必须立足于我国的基本国情。“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那么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思想也必须以现有的生产力水平为根基，不能搞“大跃进”。目前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离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共产主义还存在很大的差距，践行习近平的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思想必须坚持共建共享的原则，充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使人民在生产中共享，在共享中发展；坚持渐进共享的原则，基于现有的生产力水平差异情况，实现人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渐进过程。

(二) 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保障人民主体地位

社会主义制度是保障全体人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制度基础。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思想，必须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一是坚持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制度，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利于在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广泛地听取人民的呼声，汲取人民的智慧，凝聚人民的力量，促进经济的发展，保障人民享有经济建设成果。二是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资料归私人占有，人民不占有生产资料，导致生产越发达，人民越贫穷。“生产者只有在占有生产资料之后才能获得自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思想，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动摇，保障人民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保障人民生活水平随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提高。现阶段生产力水平整体还处于较低的状态，非公有制经济具有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功能，因此，需要支持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我国的多种所有制经济是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的，这就决定了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状态内，非资本主义的生产者也受资本主义观念的支配。”同样在公有制经济占主体的社会主义中，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也是服务于社会主义的。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不仅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还有利于保证人民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三是坚持和完善分配制度。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是衡量人民报酬的重要尺度，不仅有利于保证人民共享经济成果，还有利于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允许技术、资本等其他方式参与分配同样可以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按劳分配在分配方式占有主体地位以及其他分配方式是在按劳分配的基础上存在的，这就决定了整个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是有利于实现全体人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总之，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思想必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基本分配制度，保障人民在经济建设各个环节的主体地位。

(三) 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夯实领导基础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党的十八大强调，我们党担负着团结带领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思想，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但党的建设面临社会思想多元化等问题，统一党内思想的难度增大；部分党组织软弱涣散，队伍管理缺位；党内生活政治性、原则性下降等难题，这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思想的“拦路虎”“绊脚石”。因此，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思想，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进一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与领导能力，使我们的党更有信心带领人民应对各种挑战、克服各种阻力，实现经济与人的协同发展。一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通过在党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弘扬党内民主等有效措施增强党内生活的政治性、原则性、战斗性，构建一个战斗力强的领导班子。二是坚定理想信念。“理想信念就是

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落实人民为中心的经济思想需要共产党人在思想上认可，把它内化于心，作为自己工作的行动指南。三是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党中央在顶层设计层面，做出了许多符合广大人民利益的决策，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决策需要广大党员在思想政治行动上与中央保持一致，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不折不扣地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决策。四是改进工作作风。新形势下，部分党员干部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作风严重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思想必须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使我们党始终成为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思想的坚强后盾。五是严惩腐败。目前党内腐败问题已严重损害了人民的利益，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思想必须以零容忍的态度惩治腐败。

（四）坚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

没有扎扎实实的经济发展，就不会有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思想，必须坚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一是转变发展理念。“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一定的发展实践都是由一定的发展理念来引领的。”解决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必须用新发展理念来统领经济发展。创新增强经济发展动力；协调增强经济发展平衡性；绿色增强经济发展可持续性；开放增强经济发展内外联动性；共享增强经济发展公平性。二是发挥市场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市场是配置资源的更有效手段，促进经济发展必须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市场具有一定的逐利性，为了保证人民能在经济建设中享有发展成果，必须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三是转变发展战略。在改革开放近 40 年的发展中，我国的经济发展更多是依靠资源、资本以及劳动力等要素的投入，但是目前我国的资源和环境的承受力已经达到极限，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促进经济发展必须转变发展战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挥科技创新的支撑引领作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不是否定人民的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实现的发展不是只重视资本的发展，而是可以实现人民发展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相统一。

（《改革与战略》2017 年第 12 期）

2018 年经济工作思路和重点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解读

王小广

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和重要意义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5 年来，我们坚持观大势、谋全局、干实事，成功驾驭了我国经济发展大局，在实践中形成了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也就是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核心内容是新发展理念。

（一）主要内涵

1. 新发展理念

新发展理念对发展的要义进行了全面、全新、前瞻性注释。发展有一些基本的规律和要求。那么，未来需要什么样的发展？发展的方向是什么？新发展理念对这些问题作了全面、全新、前瞻性诠释。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发展创造了奇迹。中国的发展丰富了发展经济学内涵，中国发展理论是一个重大创新，具有世界意义。

在新发展理念中，协调发展强调整体发展观，提高了发展的整体性，这与十九大提出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是一致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是最大的短板，要补齐短板，就要提高发展的整体性。新发展理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为发展指明了方向。

2. 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5 年来，我们坚持观大势、谋全局、干实事，成功驾驭了我国经济发展大局，在实践中形成了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这也体现了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3. 从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判断到新时代、新矛盾的判断

新常态主要讲的是经济，而新时代则是就整个社会来讲的。新时代与新常态是有一定关联的，没有新常态的判断，就不会有新时代的判断；没有新时代的判断，也不会有新矛盾的提出。

4.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方面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调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发展为了谁？就是为了人民。所以说，以人民为中心是发展的出发点和立足点。

5. 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大决策

2015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更加重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2016 年、2017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出了要继续抓好“三去一降一补”。

6.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2016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也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2017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稳中求进，是工作方法和原则，也是发展的重大原则，必须长期坚持。发展要处理好“稳”和“进”之间的关系，而“进”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改革的不断前进和结构优化的不断升级。因此，“进”在很大程度上是更加重要的。

（二）重大意义

1. 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

企业需要有长期不变的发展理念，同样，国家也需要有一个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能够指引我们的工作朝正确的方向前进。所以，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不仅是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还是行动指南。

2. 体现了经济发展目标的重大调整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新发展理念，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是一个重大判断。也就是说，现在的目标就是追求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十八大报告指出，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由此可见，发展目标已经发生了重大调整。追求高质量发展也是 2017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重中之重。

3.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具有世界意义和世界影响力

我认为，无论是新发展理念，还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都是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可以借鉴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都体现了发展的热点，也都是各国追求的共同目标。

二、十九大后一段时间的发展主题和主线

（一）发展主题

现在的发展主题是什么？2017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主题又是什么？过去，在五年规划期间，总会提出发展的主题和主线。尽管 2017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没有提出明确主题，但是我认为，此次会议确实有一个非常重大的时代主题，就是“追求和促进高质量发展”。所谓“追求和促进高质量发展”并不仅仅是针对 2018 年，而应该是在“十三五”规划的后三年加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应该做的事情。我们进入了新时代，进入了新阶段，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目标发生了重大变化。追求发展的高质量，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十三五”规划的后三年要坚持，未来更长时间也要坚持。

那么，为什么要把“追求和促进高质量发展”作为今后一段时间的发展主题呢？从十九大报告中可以找到答案，从 2017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也可以找到答案。

1. 十九大作出重大判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其基本特征就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也就是说，不注重高质量，而一味地追求高速度，是不符合这个发展阶段的基本要求的，这就是阶段性变化带来的目标变化。这个判断非常重要。

2. 三个必然要求

追求和促进高质量发展，有三个必然要求。

（1）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

不追求质量和效益，经济增长就可能继续下滑，甚至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很多国家在出现阶段性变化之后，没有很好地把握机会，没有把高质量增长、高效益增长作为发展的新目标，没有实行相应的政策措施，更没有进行改革发展战略的调整、目标的调整，因此就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要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唯一的选择就是必须要追求和促进高质量发展。

（2）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要求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转化，我们不再一味地追求数量，而是追求质量和效率。过去的主要矛盾是因为我们没有吃穿用的东西，现在我们不仅有，而且要有更好的质量和更好的服务。现在，中国发展存在的主要矛盾是结构性的矛盾，是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就是要提高质量、提高协调性，这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要求。这是从长期发展趋势来讲的。

（3）是遵循经济规律发展的必然要求

发展是不断从低到高升级的过程。早期的时候不追求质量效益，也能发展，也能保持增长速度，但是到了更高要求的时候，无论是各国的发展规律、发展的自然规律、结构演化的规律，还是需求的角度——从低层次到中高层次，都要求我们必须追求高质量增长。高质量增长是未来发展的常态。之所以很多国家能够实现现代化，就是因为它到了中等收入水平以后，形成了新的发展模式——高质量发展的模式，经济不断升级，最后达到现代化的水平。这是经济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

3. 一个根本要求

未来，要想使发展有成效，使政策适合于当前或今后一段时间内的发展需要，就必须以这个为根据——追求和促进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确定发展思路、制定发展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确定这些政策和战略的根据和内在要求来自于我们的目标，就是追求高质量发展。

（二）改革与发展的主线

这个主线不是一条单一的主线，而是两条线——改革有一条线，发展有一条线。中国处在改革和发展并行的、不断前进的过程中。发展和改革的共同推进，最后形成现在的发展态势。要保持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就必须培育新动能，就必须克服发展中的体制机制障碍，要提高供给效益，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样的发展要求，必然要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来实现。

2015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后来又明确提出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我国改革的主线自改革开放初就一直不断发展，现在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时期，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重点、为主线、为主要抓手，就是要培育新动能，要解决体制机制的矛盾。要想提高供给效益，要想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必须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另一条主线是结构调整。当然这里的以结构调整为主线有新的含义。根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结构调整为主线”有了新的内涵。现在，我们到了更高的阶段，到了高质量发展的阶段，就必须明确结构调整的发展主线：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培育新动能为主线；以补短板、提高发展的整体性为主线。这是发展主线的两个部分。过去，我们追求的是高速增长的动能，全要素生产率并不强，主要靠要素投入、靠投资。到了新时代、新阶段，我们要有新的动能。十九大报告提出三大变革，其中动力变革就是培育新动能。新动能是新时代发展的主线。同时，限制发展效率和发展质量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有很多短板没有补上。我们的区域发展有短板、城乡发展有短板、生态发展

有短板、民生发展也有短板。只有补短板，才能提高发展整体性，提高发展的效益和质量。这是发展的主线，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培育新动能，二是补短板，提高发展的整体性。

三、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要求

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那么，高质量发展应该怎么衡量？

第一，确立指标体系、标准体系。

为了推动高质量发展，首先要做的就是确立指标体系、标准体系。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进”是结构优化、体制创新，而结构优化的内涵也很丰富。第三产业的比重不断提高，高科技、新经济发展占比不断上升，微观企业、宏观经济创造的效益明显提高，这些都是质量、效益提高的指标。这个指标要怎么设计、怎么评价？这是现在高质量发展面临的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用什么来衡量高质量发展？就是从结构指标、全要素生产率的综合效益指标来设计。“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这是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非常关键，而全要素生产率的核心是创新，所以创新能力就是衡量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评估各地方、企业、行业是否是高质量发展，首先要有指标体系、标准体系。

第二，建立统计体系。

在衡量是不是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有些是不能用指标体系、标准体系来衡量的，比如就业质量、产业速度和水平等，所以就要建立统计体系和统计制度。过去衡量经济增长是以速度、GDP 为主要指标，现在的统计体系要发生改变。在统计体系中，有些可以通过直接指标看到质量是否提高了，有些则需要通过估算、测算。对于不能通过直接指标统计的，可以从能够反映质量效益的指标来衡量经济的增长。要加强对质量和效益指标的重视，比如企业的盈利能力、稳定增长的情况、单位 GDP 的产出、单位 GDP 的耗能、教育投入、教育情况等。相关统计体系也会向高质量发展倾斜。此外，在统计体系中还应该重视就业，就业就是质量指标。完善统计体系、确立统计指标，以此来衡量高质量发展，这也是未来要做的事情。

第三，形成政策体系。

要推动高质量发展，就要看能创造多少就业、能带动多少技术进步、能节约多少国家公共资源。政策要根据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做评估。评估一个政策是不是好、是不是合理、是不是科学，就是根据高质量发展指标和目标要求来看的。

第四，形成绩效评价、政绩考核。

推动高质量发展还需要有绩效评价和政绩考核，就是看事情做完之后是不是产生了效益，各级政府做的这些事情是不是达到了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在新的发展阶段，要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要综合评估，把质量和效益作为项目、政策是否成功的主要标准。

可以说，高质量发展对指标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政策体系、政绩考核都提出了新的要求。

四、促进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任务和工作重点

（一）宏观经济政策取向

1. 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向不变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向不变，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确保对重点领域和项目的支持力度，压缩一般性支出，切实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财政政策是调结构的，代表国家执

行国家战略。也就是说，通过财政政策推进一些重大工程的发展。积极的财政政策，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财政赤字率。过去几年，我国的财政赤字率在 2% 左右，2016 年达到 3%，2017 年将会达到 3% 以上。从 GDP 规模变化看，2018 年财政支出相比 2017 年较为宽松，所以 2018 年的财政赤字率不仅仍将保持 3% 左右，而且还会有所提高。

2. 稳健的货币政策要保持中性

稳健的货币政策在过去、在某段时期不完全是中性政策，还存在过度偏松甚至长期偏松的情况。现在，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就应该采取中性政策，尤其是 2017 年特别强调要保持中性。这是从我国的经济增长能力、防范金融风险的角度考虑的。真正的中性政策，必须考虑经济本身的增长能力，在没有更多更大的刺激政策下，经济也要实现 6%-7% 的增长，特别是 6.5% 左右的增长。宽松的刺激政策可能会带来房地产泡沫，增加企业杠杆率，进而加大金融风险。要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正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指出的，管住货币供给总闸门，保持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过去两三年，我国货币政策有所收紧，这主要是结构性的，针对的是大量资金从实体流入虚拟部门并在金融体系内部循环而形成的很多风险。所以，从防控金融风险的角度，对货币政策做了微调，就是要保持中性。

3. 结构性政策要发挥更大作用

什么是结构性政策？过去，党中央、国务院创新宏观调控思路 and 方式，提出区间调控、定向调控，而定向调控就是结构性政策。会议再次提出“结构性政策要发挥更大作用”，其实指的就是结构性矛盾、体制性矛盾还非常突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也反映的是结构问题。要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必须靠结构性政策。这就是为什么在提出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强调结构性政策要发挥更大作用。会议指出，强化实体经济吸引力和竞争力，优化存量资源配置，强化创新驱动，发挥好消费的基础性作用，促进有效投资特别是民间投资合理增长。

4. 社会政策要注重解决突出民生问题

十八大以来，我们突出强调三大政策——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这里社会政策不仅要托底，而且要补短板。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社会保障水平不断提高，但是社会发展中还有许多短板，还有很多老百姓需要迫切解决的民生问题。因此，2017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社会政策要注重解决突出民生问题，积极主动回应群众关切。那么，怎样回应群众关切？就是要加强基本公共服务，加强基本民生保障，及时化解社会矛盾。这讲的是社会政策。社会政策不只是托底的政策，也是补短板的政策。

5. 改革开放要加大力度

前面讲到了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还有两项政策是产业政策要准和改革政策要实。这是十八大以来的要求。2017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改革开放要加大力度”，我认为这也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发出的重要信号。什么意思？对于改革开放，我们一直在不断地探索、完善和深化，但是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改革开放提出了新的要求，就是在经济体制改革上步子再快一些。首先，这反映了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因为高质量发展没有改革创新是很难实现的，即使一时实现了，也很难保持下去。因此，要加快改革的步伐，才能积极有效地促进高质量发展，这是内在要求。再有，尽管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不像过去那么高，但是我们能够实现充分就业，经济发展的协调性、稳定性在进一步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改革开放加大一些力度，我们也能够承受。因此，我认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改革开放要加大力度”有两点考虑，一是高质量发展的需要，二是我国现在的经济发展可以承受。通过深化改革，去产能、调结构，可能会使经济增长速度有所减缓，但是我们的就

业还很好，所以说改革不会导致风险，也不会形成很强的阻力。2017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发出了改革开放加快的信号，这是中国未来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证。改革先行、改革有力，一定会推动结构调整，推动新动能培育，使发展质量更高。这是明显地强调改革政策。

(二) 2018-2020 年的主要任务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也是“十三五”规划实施的最后一年。“十三五”规划的后三年，有许多紧迫的任务，最紧迫的任务是脱贫攻坚战。“十三五”规划提出，到 2020 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这是人类发展非常了不起的目标。现在看来，这两年下来执行情况还是非常好的。脱贫攻坚总的时间是五年，现在还剩三年，剩下的是最难啃的骨头，所以要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这三年，特别是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

这三大攻坚战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我们必须举全社会的力量来攻坚。

1. 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

主要是讲防范金融风险。很多国际机构总是讲中国的债务风险、政府债务风险，总是想把中国跟欧债危机相关联上。我想中国债务问题跟西方发达国家和其他国家是不一样的，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中国金融是跟国际连在一起的，中国金融市场、货币市场、商品市场都是与国际关联的，所以金融的风险具有世界性，我们要重点防范金融风险。金融风险主要怎么防范？提出要服务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促进形成金融和实体经济、金融和房地产、金融体系内部的良性循环。这讲出了我们金融的三大毛病——金融支持实体经济不够，金融支持房地产过度，金融体系内部存在很多问题。所以，要形成一个良性的关系，良性循环之后就是稳定的，就是低风险的。做好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和处置，坚决打击违法违规金融活动。特别要加强薄弱环节监管制度建设。

2. 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

主要是攻坚向深度贫困地区聚焦发力，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加强考核监督。2016 年、2017 年这方面工作都做得有条不紊，成效显著。我觉得现在主要是集中发力，特别是精准脱贫，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3.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有一个总体目标，就是要使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幅减少，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重点是打赢蓝天保卫战，调整产业结构，淘汰落后产能，调整能源结构，加大节能力度和考核，调整运输结构。

(三) 八大重点工作

2016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讲的任务是四条：第一条，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第二条，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第三条，着力振兴实体经济；第四条，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那么，2017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讲了 8 项重点工作，是不是中国的问题多了？不是。我认为这是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需要，改革、发展、开放、保障民生、住房问题、生态文明建设，都是发展的重要方面。

一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5、2016、2017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提了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 2017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的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具有新内涵、新要求、新目标的。

二是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调动微观经济积极性，通过国企改革激发市场活力，全面实施并不断完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破除歧视性限制和各种隐性障碍，加快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

三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四是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也是短板。区域发展和乡村发展是两个发

展难题，今年这部分内容有了新的要求。

五是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全面开放新格局也是十九大报告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以后，我们在这方面也要有大作为。只有把全球化这个大旗高高举起，我们才会有更大的国际发展空间，并通过开放带动国内发展，带动国内改革。

六是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这在 2017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有很多亮点。

七是加快建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2016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2017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完善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要建立制度，不光“破”，还要“立”。

八是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很重要，而且力度越来越大。

下面，我具体讲一下八个方面任务。

1.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016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任务、要求、出发点等问题讲清楚，主要提出提高供给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力的要求。2017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针对发展的问题，按照十九大提出的强国要求，提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三个转变”。推进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十九大报告是强国宣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核心部分就是强国思想，是使中国更强大的思想。对于具体做法，2017 年提出了新的要求。什么要求？就是继续深化“三去一降一补”，但是重点放在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提出重点在“破”、“立”、“降”上下功夫。“破”——大力破除无效供给，把处置“僵尸企业”作为重要抓手，推动化解过剩产能。把低效的东西淘汰了，剩下就是高质量的发展，这是“破”。“立”——大力培育新动能，强化科技创新，推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培育一批具有创新能力的排头兵企业，积极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在十九大报告里也被特别强调。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是可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军队的技术相对比较高，军民融合能够形成效益，同时加快技术向社会转移，形成“水涨船高”的效应。关于“降”，这次会议也提出了新要求、新举措：一是大力降低实体经济成本。我们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包括结构性减税、清理收费。二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继续清理涉企收费，加大对乱收费的查处和整治力度。消除市场一体化的体制机制性障碍，制度性交易成本在下降。三是深化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等行业改革，降低用能、物流成本。“十九大”报告提出打破行政性垄断，深化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等行业改革，目的就是降低用能和物流成本。

2. 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是新的东西。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做的事情太多了。2018 年就要开局，要好好去谋划，所以，首先要求科学制定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在规划上，我认为应该舍得花工夫，舍得花钱，规划得越好，结果就会越好，实施就会越有效。关于乡村振兴战略，十九大报告提的是比较原则性的东西。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的则比较具体，紧扣高质量发展，提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农业政策从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深化粮食收储制度改革，让收储价格更好反映市场供求，扩大轮作休耕制度试点。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规划中，规划、机制、质量、收储、休耕是关键词，也几项重点工作。收储制度改革、休耕制度改革，都是稳定农业生产、提高农民收入的长效举措。

4. 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这一部分也有新亮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要求里最突出的特点就是

关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想解决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首要任务就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个要求很高，区域协调并不是你发展、我发展就可以，而是要实现基本区域之间的平衡和公平。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一带一路”建设，都在不断完善，不断深入。同时，还提到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西部、东北、东部等地区。最有新意的是，科学规划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城镇化方面，提高城市群质量，推进大中小城市网络化建设。最后有两点比较重要，一是加快户籍制度改革落地步伐，二是引导特色小镇健康发展。特色小镇发展是未来乡村区域振兴、区域发展的亮点。

5. 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我们在不断深入推动开放。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并没有特别讲到自由贸易港，这个政策制定要更长一点，不是那么紧迫。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试点还在扩大完善，在成熟基础上再推进自由贸易港。这一部分大家比较关注的是下调部分产品进口关税。这是推进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新提出的内容。推进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工作，确实在加紧推进，而且成效显著，尤其是“一带一路”建设。

6. 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

在这一部分，很多老百姓关注的问题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要求针对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精准施策，着力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择校热”、“大班额”等突出问题，解决好婴幼儿照护和儿童早期教育服务问题。这是教育方面的。还有一些短板问题，比如：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解决好性别歧视、身份歧视问题，解决好“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特别提出，着力解决网上虚假信息诈骗、倒卖个人信息等突出问题。这是非常务实、接地气的问题。

7. 加快建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不只是 2016 年提出的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要求，还要求建立住房制度，明确提出来供应主体是多元的，保障是多渠道的，租购并举，对供应、保障和租购市场行为都有一个界定。特别是要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特别是长期租赁，支持专业化、机构化住房租赁企业发展。完善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保持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大家应该关注这两句话：一是长效机制，长效机制有很多，我认为主要是税收制度，肯定会有办法、肯定有步骤使征税政策不对房地产产生过强冲击；二是 2018 年的房地产调控政策要保持连续性、稳定性，不会轻易变的。房地产政策基本上是清晰的，一定会坚持的，房地产调整也是必然的，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8. 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在这个方面，我们这些年做了很多事，力度很大，特别是前一段时间的监管非常有震慑力。“十三五”规划的后三年，2018 年以后或者更长时间怎么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我觉得有一个新的口号、新的方案、新的行动，那就是启动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国土绿化，不要理解为栽树种草，我认为国土整治，应该是国土规划整治长远行动方案。这是一个大事。同时要解决农村两大问题或者整个生态环境两大问题，一是水的问题，二是土壤问题，提出深入实施“水十条”，全面实施“土十条”。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系。

(宣讲家网 2017 年 12 月 25 日)

习近平经济思想开启中国经济新篇章

杨宜勇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善于把握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关键环节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我们要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支持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瞄准国际标准提高水平。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加强水利、铁路、公路、水运、航空、管道、电网、信息、物流等基础设施网络建设。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创新作为最基本的战略支撑。我们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加强应用基础研究，拓展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突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为建设科技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网络强国、交通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提供有力支撑。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强化战略科技力量。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

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强对中小企业创新的支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不能搞华而不实的花架子，要全面提高科技创新能力。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我们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保障农民财产权益，壮大集体经济。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不能忽视农业农村和农民，农民的素质在农业和农村现代化进程中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我们加大力度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强化

举措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深化改革加快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发挥优势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创新引领率先实现东部地区优化发展，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雄安新区。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导向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支持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发展。加快边疆发展，确保边疆巩固、边境安全。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千万不能走重沿海轻内陆、重陆地轻海洋、重特区轻普区的老路，一定要实现更加均衡的发展。

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建设，必须要有世界眼光和全球思维。竞争力是参与者双方或多方的一种角逐或比较而体现出来的综合能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善于判断新的历史性经济变化

习近平总书记高屋建瓴，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行了高度的概括，指出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

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详细解读了“经济新常态”九大特征：从消费需求方面看，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从投资需求方面看，传统产业相对饱和，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从出口和国际收支方面看，全球总需求不振，同时我国出口竞争优势依然存在，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从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方面看，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新特征。从生产要素方面看，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人口减少，要素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从市场竞争方面看，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统一全国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经济发展的内生性要求。从资源环境约束方面看，环境承载能力已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从经济风险方面看，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风险总体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从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方面看，既要全面化解产能过剩，也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认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改变的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改变的是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要更加注重满足人民群众需要，更加注重市场和消费心理分析，更加注重引导社会预期，更加注重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更加注重发挥企业家才能，

更加注重加强教育和提升人力资本素质,更加注重建设生态文明,更加注重科技进步和全面创新。

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善于对中国经济发展进行系统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搞好顶层设计,及时推出一些有针对性的改革措施,坚持整体渐进和局部突破相结合,大胆探索,务求实效”。

一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党的十八大后,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这非常有利于在全党全社会树立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有利于抑制消极腐败行为,也有利于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二要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不断探索基本经济制度有效实现形式。习近平总书记不仅对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地位作了新的阐述,而且对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作用作了新的概括;不仅对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提出了战略要求,而且对全面深化国有经济改革作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对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新的举措。

三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实施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当前财税体制改革的重点主要涉及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完善税收制度,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等。要实施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国防、外交、国家安全、关系全国统一市场规则和管理等作为中央事权;部分社会保障、跨区域重大项目建设维护等作为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权,逐步理顺事权关系;中央可通过安排转移支付将部分事权支出责任委托地方承担;对于跨区域且对其他地区影响较大的公共服务,中央通过转移支付承担一部分地方事权支

出责任。

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善于抓住当前经济升级的“牛鼻子”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11月10日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发表重要讲话,首次提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要通过一系列政策举措,特别是推动科技创新、发展实体经济、保障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政策措施,来解决我国经济供给侧存在的问题。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既突出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注重完善生产关系,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着眼当前又立足长远。要从生产端入手,重点是促进产能过剩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降低企业成本,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供给侧和需求侧是管理和调控宏观经济的两个基本手段。需求侧管理,重在解决总量性问题,注重短期调控,主要是通过调节税收、财政支出、货币信贷等来刺激或抑制需求,进而推动经济增长。供给侧管理,重在解决结构性问题,注重激发经济增长动力,主要通过优化要素配置和调整生产结构来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进而推动经济增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遵循和基本前提。在马克思主

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质上就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调整和完善，就是要通过对生产方式中的物质技术结构和社会关系结构进行双重维度的整合优化，从而更好地理顺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的交互关系，以便在不断解决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过程中更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实现。脱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些基本原理，盲目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必然会舍本逐末、迷失方向。

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善于突破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

2014 年 11 月 10 日，习近平主席在北京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同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对话会上致辞时指出，“对中国而言，‘中等收入陷阱’过是肯定要过去的，关键是什么时候迈过去、迈过去以后如何更好向前发展。我们有信心在改革发展稳定之间，以及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促改革之间找到平衡点，使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换挡之后的经济增长新引擎已经点燃。“十三五”时期中国将不再纠结于 GDP 是否增长 7%，而更加注重 GDP 的科技含量、民生福祉，这是尊重经济规律，做实经济质量的明智之举。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过：“我们在国际上腰杆能不能更硬起来，能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很大程度取决于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从现实状况看，中国的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带来的发展空间很大，国内市场潜力巨大，生产要素综合优势明显。因此，只要我们继续向纵深推进改革开放，不断释放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从而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同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就会顺利实现 2020 年国民生产总值再翻番的目标，就有信心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人民论坛》2017 年 34 期）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引领宏观调控体系布局

高培勇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十九大之后我们在经济工作领域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就是紧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并且把现代化的经济体系建设和宏观调控完善融合在一起。如果说它是一个新任务新部署，那就是围绕建设有效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现代化经济体系来进行宏观调控体系的布局。

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思想的一条主线就是党和国家领导经济工作的理念、思想、战略上发生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则集中体现在我国宏观调控体系的深刻变化上。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涉及到宏观调控的有两个方面：一是要适应我国经济发展主要矛盾的变化来完善宏观调控；二是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实施包括宏观调控在内的若干方面的根本要求。

我们应该意识到，现在的宏观经济环境在十九大之后，或在进入新时代之后是大不同于以往的。例如，我们有三方面的概括：一是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二是新发展理念；三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我们一一列数这三方面的关键词的时候，必须注意并且时刻警醒自己的是，新常态是相对于旧常态而言的，新发展理念是区别于旧发展理念而言的，当讲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候，它直接针对的是需求管理政策。

概括起来，在十九大之后，或进入新时代之后中国宏观调控体系的变化凝结于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分析的视角。如何判断经济形势变化，是解决对经济形势变化怎么看的问题，这个怎么看在十八大以来实际上经历了一个极其深刻的变化。在以往我们讨论经济形势的时候，所采用的分析视角，要么是周期性要素，要么是总量性因素，人们会把它理解为供求总量平衡其中的一个总量性因素的变化。但是当今天概括经济形势面对突出矛盾和问题的时候，习近平总书记讲到，根源是重大的结构性失衡所导致的经济循环不畅，主要是供给侧问题，主要是结构性问题。当主要矛盾发生变化，而矛盾的主要方面也跟着发生变化的时候，我们的分析视角显然不能停留于周期性因素和总量性因素的

分析，必须由周期性因素和总量性因素延伸到结构性因素，延伸到供给侧，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第二，发展理念。当我们提到新发展理念的时候不仅讲的是创新、协调、开放、共享、绿色，而且要从抽象的发展理念延伸到具体的经济发展目标上。现在这个具体的发展目标集中表现在由高速增长阶段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就是要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这样一种发展，这种变化也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政策主线。我们以往的宏观调控的政策主线概括起来就是立足需求侧，紧盯需求总量进行对冲性的逆向调节。当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时候我们着眼于扩大需求，当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时候我们着眼于压缩需求，它追求的是一种短期稳定。而今天谈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候，相对于以往的需求管理，它更多强调要立足于供给侧，因为是结构调整，而非总量调节，它瞄准的是提高供给质量，优化供给结构，这是第三个变化。

第四，施策机制。我们怎么来实现宏观调控的目标，怎么把宏观调控的目标落到实处，在以往我们主要讨论的是政策安排问题，主要限于政策层面的调整。政策区别于改革最大的不同点，它主要瞄准的是短期的安排，而非长期的制度调整。而今天在谈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候，它的根本途径是放在改革上的，而限于政策层面的调整。因此，以改革的办法突破体制机制性的障碍，以推进各种基础性的改革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条件，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区别于以往的需求管理的一个主要的方面。

以上四个方面的变化应当说是非常显著的，在过去五年当中是逐步地演化到今天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也将持续到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当我们谈到这四个方面变化的时候，我们不妨以 2016 年为基础举几个现实的例子。

比如，积极财政政策。今年的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说积极财政政策的趋向不变，它究竟在新时代所发生的变化是什么？我们可以立刻想到从 1998 年之后每当提到“积极”的时候，我们是把它等同于扩张的，大家总是习惯于按照以往的思维惯式去解读。必须意识到它和过去的理解是有很大变化的，因为我们主攻方向已经转化到了结构性调整上，我们着力点、着重点的变化就说明，今天的积极财政政策已经和过去那样单纯的致力于需求总量扩张的积极财政政策大不相同了，必须站在供给侧的角度，站在结构性调整的角度去理解积极财政政策。

又比如，投资。我们都知道投资是积极财政政策一个重要引擎，在过去启用投资作为宏观调控政策主要依托的时候，我们瞄准的是总量刺激，致力于如何增加支出，如何拉动和扩张需求。但是，在十九大和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围绕投资的论述都提到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当把投资和优化供给结构拼接在一起的时候，人们会注意到，它省略掉的、漏掉的是投资对拉动需求的那样一种关键性作用。究竟投资主要干的是什么事情？瞄准的是什么样的目标？我们是能够体会到的。

再比如，赤字。到积极财政政策必然涉及到赤字，赤字的规模多大，增量多少，占 GDP 的比重怎样，历来是讨论的一个目标。在以往，我们常常认为，为了拉动需求，可以不惜扩大赤字，为了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也可以不惜扩大赤字。但是在今天面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样一条主线，面对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这样一场排名第一的攻坚战，赤字的多少就不再是那样的考量了，而要把如何防范、化解由财政赤字引发的经济的、金融的风险放在第一位来考虑。因此，3%这样一个财政赤字的控制线在

今年没有被突破，明年更不能被突破。我们要对 3%这样一个控制线心存敬畏，守住底线。

第四个例子，减税降费。提到减税降费的时候大家普遍都很欢迎，但是今天的减税降费 and 以往的减税降费具有大不相同的表现，为什么呢？因为以往讲到减税降费的时候，瞄准的是扩大需求，如何通过减税降费来增加企业和居民的需求是减税降费的主要目的。而今天的减税降费瞄准的是什么呢？是降低实体经济的运行成本。站在降低实体经济运行成本的角度讲，减税降费的财源支撑，就不能是增列赤字，不能是增发国债，而要和政府支出的削减、税费结构的调整联系在一起。因为如果以赤字的方式去支撑减税降费的话，我们所看到的，只是政府融资方式的替代，而这种融资方式的替代最终不会降低企业的成本，反而会增加企业的成本。因为债终归要还，即便债可以不还，可以通过发行置换债的办法长期累积下去，其中的债务利息总是躲不掉的，逃不掉的，因而这样一种减税降费和去年和以往的减税降费就有很大的区别了。

进入新时代之后，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引领中国经济发展的理念、思想、战略的时候，最需要注意的是要全面地转变理念、思想和战略。不能照搬以往的思维方式来看待今天的经济形势，不能照搬以往的经济理念来看待今天的经济政策，甚至不能照搬以往的思维路径来执行今天的宏观经济政策。因此，我们要明确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而不是进入新时代之前的经济环境，要理解我们现在面对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日益增长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供给之间的矛盾而不是以往那样一种矛盾表述，明确我们现在着力推进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建设而不是以往的需求管理以及相对粗旷的、追求高速增长的经济体系，我们现在努力追求的目标是更好的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而不是简单的物质文化方面的需要。对于今天宏观调控体系的布局 and 宏观调控体系已经发生并且正在经历的变化，我们就会别有一番新的见解。

（本文根据作者在 2017 年 12 月 21 日中国新闻社“国是论坛——新时代新经济”上的演讲内容整理，并经作者修改审定）

（中国社会科学网 2017 年 12 月 24 日）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社会主义金融思想

王立民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配置资源要素的枢纽、调节宏观经济的杠杆，金融业的发展水平直接影响着实体经济的兴衰。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金融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指明了金融工作重点、工作方法和工作理念。他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深刻指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还对金融工作做了一系列重要指示。这些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是做好新时代金融工作的根本遵循，也为我国金融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笔者结合多年的研究和思考，从以下六个方面来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金融思想的丰富内涵和指导意义。

一、精准定位：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

金融发挥着媒介交易、配置资源、发现价格、管理风险等重要功能，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深刻指出：“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改革发展是国家改革发展的重要内容，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金融业发展助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施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实施了以出口导向拉动的工业化、以投资驱动的城镇化、以生产效率提升带动的全球化为代表的经济战略，经济实现了持续 35 年的两位数高速增长，并于 2010 年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大量的资金支持，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必要条件。

（二）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实体经济是金融发展的根基，金融则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没有金融“血液”的滋养，实体经济就会死气沉沉、了无生机。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他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着经济健康发展”；“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金融工作和金融安全始终是高度重视的，我国金融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金融成为资源配置和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

根本举措。

（三）金融创新具有引领和示范功能。习近平总书记非常注重金融创新的积极作用。他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农村金融仍然是个老大难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要在体制机制顶层设计上上下功夫，鼓励开展农民合作金融试点，建立适合农业农村特点的金融体系。要在规范运行、严格监管、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允许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向金融机构抵押融资，采取多种方式为农业发展开辟新的融资渠道。新型农民搞规模种养业，风险也加大了，农业保险一定要搞好，财政要支持农民参加保险”。他还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致辞中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血脉通，增长才有力。我们要建立稳定、可持续、风险可控的金融保障体系，创新投资和融资模式，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建设多元化融资体系和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普惠金融，完善金融服务网络”。这些重要论述阐明了金融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和改革方向。

（四）金融能力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力量。“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离不开强大的金融能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得到各方面支持，特别是金融的助力，同时也对金融业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二、问题导向：准确判断当前面临的金融风险

坚持问题导向贯穿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全过程。问题是开端，既是出发点，也是着眼点。提出问题、发现问题并直面问题才能积极地解决问题。金融业存在问题显而易见。金融风险是金融业本身性质决定的，金融业链条长，市场信息不对称，价值实现过程曲折，又易受外部因素影响，还具有突发性、隐蔽性、传染性等特质。2017年12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尽管我国金融发展改革取得了重大成绩，但应清醒认识到，在当前金融领域还存在不少矛盾和问题。例如，虽然我国总体金融机构类型和数量不少，但金融服务总体仍然不够，特别是针对农村和小微企业的基层金融服务总体不足；银行、证券、保险业发展不协调，城乡、区域金融资源配置不合理；总体金融结构仍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资本市场制度尚不完善，直接融资占比仍然偏低，宏观杠杆率高企的同时经济金融风险集中于银行体系；金融体制机制还不健全，金融创新能力和竞争力不强，金融风险隐患还比较多，等等。对这些问题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才能充分发挥金融效能。

（一）直面金融领域存在的风险和安全隐患。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金融风险，特别强调要格外小心、审慎管理金融风险。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5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了整治金融乱象、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工作；在中央政治局第40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指出了十个方面的金融安全隐患。从目前来看，我国面临着金融杠杆率和流动性风险高、信用风险高、影子银行风险高、违法犯罪风险高、房地产泡沫风险高、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高等现实情况。

（二）互联网金融领域中存在诸多的高风险。近些年互联网金融蓬勃发展，由于互联网金融业务更加复杂，产品的关联性和风险传染性更高，也更容易出现风险。一些企业打着互联网金融等幌子进行非法集资、金融诈骗，行为屡禁不止，少数机构违规违法操作，重大案件时有发生。许多互联网金融机构正在向三四线城市布局，而这些地区的金融监管相对薄弱，风险发生的概率增加。

（三）深刻剖析金融风险产生的原因和土壤。尽管多年来我国金融发展改革取得了重大成绩，但金融体系总体上仍不健全，金融发展与金融深化任务十分艰巨，金融体制改革与金融创新任重

道远。如何提高金融支持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是推进金融改革的首要因素。关于金融风险产生的原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扩散的背景下，我国经济周期性、结构性、体制性矛盾叠加的结果”。从周期性看，我国经济金融经过上一轮扩张期后，进入下行“清算”期。从结构性看，实体经济供需失衡，金融业内部失衡，金融和实体经济循环不畅。从体制性看，一些市场主体行为出现异化，道德风险明显上升，而金融监管很不适应。应对金融问题既要沉着冷静又要积极主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金融形势是良好的，金融风险是可控的。同时，在国际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因素综合影响下，我国金融发展面临不少风险和挑战，必须冷静面对、积极处置，赢得主动。

三、牢记天职：全面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和水平

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是金融的本分。金融只有在为实体经济服务中才能实现自身持续健康发展。面对金融和实体经济结构性失衡、房地产泡沫、信用违约风险加大、资本外流仍在继续的严峻形势下，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要让金融回归本源，服从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要把为实体经济服务作为金融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全面提升服务效率和水平，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和实体经济多样化的金融需求。

（一）把握好经济和金融的关系至关重要。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改革的导向和原则，也是检验金融改革成效的标准和依据。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着经济健康发展。做好金融工作，保障金融安全是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基本条件。唯有把握好经济和金融的关系，才能让金融市场在保持稳定的同时有效服务实体经济。

（二）充分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效率是效能的集中反映，而市场是提高效率的有效途径。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注资本市场的作用，对资本市场的发展提出了具体要求，如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加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场等等。长期以来，间接融资在我国金融体系中居主导地位，直接融资市场发展相对滞后。为此，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推进各领域改革，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是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总方向，也是金融体制机制改革的目标方向。

（三）金融要服务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的基础上，集中全党和全国人民智慧，从理论到实践不断探索的结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基于中国实践的理论综合性集成创新，是中国经济和中国模式在新时期的一次探索性改革和调整，其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新时期的创新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入阐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现实依据、深刻内涵、根本目的、工作要求和科学方法，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科学指导和根本遵循。金融既可以在短期需求调控中发挥作用，也是长期结构调整和供给侧管理的关键环节。从需求端看，货币政策是短期需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金融体系创造货币、扩大货币供应量，可以促进消费、投资和出口增加，刺激经济增长。从供给侧看，健全的金融体系有助于增加资本供给、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调整，进而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

四、守住底线：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

近年来，受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等外部环境影响，以及过度金融创新带来杠杆高企，金融领域的风险隐患也有所增多。金融既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也是风险集中高发的领域，一旦发生系统性风险，就可能引发整体经济危机乃至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因而必须切实加强金融风险防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特别是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务，也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他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第一阶段会议上、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在 2016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在中央政治局第四十次集体学习时，都强调要切实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深刻指出：要“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当前，我国金融风险集中表现在不良资产风险、流动性风险、债券违约风险、影子银行风险、外部冲击风险、房地产泡沫风险、政府债务风险、互联网金融风险等八个方面。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核心，就是要处置一批风险点，防止风险由“点”扩散成“面”，酿成重大风险问题，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

（一）加强金融风险防范的极端重要性。做好金融风险防范，是保障经济安全的内在要求，也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充分认识金融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切实把维护金融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一件大事，当作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件带有战略性、根本性的大事，并指出今后五年可能是我国发展面临的各方面风险不断积累甚至集中显露的时期，要把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科学防范，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着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着力完善金融安全防线和风险应急处置机制，力争不出现重大风险或在出现重大风险时扛得住、过得去。

（二）要借鉴国际经验不断强化金融监管。面对国际金融危机，主要经济体都对其金融监管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主要做法有统筹监管系统重要金融机构和金融控股公司，尤其是负责对这些金融机构的审慎管理；统筹监管重要金融基础设施，包括重要的支付系统、清算机构、金融资产登记托管机构等，维护金融基础设施稳健高效运行；统筹负责金融业综合统计，通过金融业全覆盖的数据收集，加强和改善金融宏观调控，维护金融稳定。这些做法都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

（三）金融监管的方向和重点。强化金融监管是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加快建立符合现代金融特点、统筹协调监管、有力有效的现代金融监管框架，坚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同时指出要统筹监管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统筹监管金融控股公司和重要金融基础设施，统筹负责金融业综合统计，确保金融系统良性运转，确保管理部门把住重点环节，确保风险防控耳聪目明，形成金融发展和监管强大合力，补齐监管短板，避免监管空白。决定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就是要强化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范职责，落实金融监管部门监管职责，并强化监管问责，针对突出问题加强协调，强化综合监管，突出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

五、破解之策：坚定不移推进金融改革开放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而推进金融改革则是重要举措。近年来，我国金融业发展加快，金融领域持续创新，金融体系复杂度、开放度不断提高，迫切需要加快金融改革。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优化金融机构体系，完善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完善外汇市场体制机制，深化多层次资本市场改革，健全保险市场功能，引导期货市场健康发展。多年来，我国主要是国际规则的跟随者和遵循者，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缺少话语权。

随着我国金融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增强，积极参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有助于进一步放大我国的“金融稳定器”作用，增强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性，构建新型全球经济稳定机制，形成全球金融安全网。

（一）参与国际金融治理的必要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过去数十年，国际经济力量对比深刻演变，而全球治理体系未能反映新格局，代表性和包容性很不够。全球产业布局在不断调整，新的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日益形成，但贸易和投资规则未能跟上新形势，机制封闭化、规则碎片化十分突出。全球金融市场需要增强抗风险能力，不过全球金融治理机制未能适应新需求，难以有效化解国际金融市场频繁动荡、资产泡沫积聚等问题，因此国际经济金融治理亟待改变。

（二）改革国际金融治理的目标。目标是发挥效能的前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体系，提高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确保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对于我国而言，参与全球治理的根本目的，就是服从服务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审时度势，努力抓住机遇，妥善应对挑战，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向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三）改革国际金融治理的重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变革全球治理体制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金融组织切实反映国际格局的变化，推进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法治化，努力使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意愿和利益。针对二十国集团改革，他强调，要把二十国集团建设成稳定世界经济、构建国际金融安全网、改善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力量。

（四）亚投行在改善国际金融治理中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主要任务是为亚洲基础设施和“一带一路”建设提供资金支持，将同域外现有多边开发银行合作，相互补充，共同促进亚洲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是在基础设施融资方面对现有国际金融体系的一个补充。亚投行的建立代表了各方团结合作共谋发展的愿望、决心和行动。亚投行同“一带一路”倡议相匹配，是惠泽各方的多赢之举，将同其他多边开发机构一道，为推进亚太经济融合和发展作出贡献。亚投行的成立是国际经济体系改革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也是近年来中国为推动全球金融治理“存量”和“增量”改革、提升新兴经济体话语权而努力的重要缩影。

六、金融效能：着力营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

金融生态是金融运行的外部环境，也是金融运行的基础条件。金融生态包括法律制度环境、市场体系的完善程度、社会信用体系、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加强金融生态建设不仅有利于构建完善高效的金融体系，推动金融市场建设、信用建设和制度建设，完善金融运行基础，有效发挥金融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而且也为新常态下防范控制金融风险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健全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健全金融法治。因此，在深化金融改革的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金融生态的重要作用，通过深化改革，强化金融基础设施的薄弱环节，保障金融市场安全高效运行和整体稳定。

（一）建立健全符合我国国情的金融法治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在整个改革过程中，都要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加强对相关立法工作的协调，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此后，“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的表述见

诸习近平总书记的数次讲话中。他强调，要坚决整治严重干扰金融市场秩序的行为，严格规范金融市场交易行为，规范金融综合经营和产融结合，加强互联网金融监管，强化金融机构防范风险主体责任，建立健全符合我国国情的金融法治体系。金融法律是国家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立法是保证金融改革的目标和方向，促进金融改革和巩固改革成果。经过多年的努力，目前我国金融法制体系已基本建立。

（二）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步伐。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他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五次会议上强调，要加快推进对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建设，有利于促使被执行人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决定的义务，提升司法公信力，推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要建立健全跨部门协同监管和联合惩戒机制，明确限制项目内容，加强信息公开与共享，提高执行查控能力建设，完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完善党政机关支持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制度，构建“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信用惩戒大格局，让失信者寸步难行。2016年12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37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对突出的诚信缺失问题，既要抓紧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又要完善守法诚信褒奖机制和违法失信惩戒机制，使人不敢失信、不能失信。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下，国家发布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系列改革文件，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协调下，相关单位狠抓落实，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整体水平大幅提高，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三）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只有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集中统一领导，才能确保金融工作健康良性发展，才能确保金融改革发展正确方向，才能确保国家金融安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完善党领导金融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制度化建设，完善定期研究金融发展战略、分析金融形势、决定金融方针政策的工作机制，提高金融决策科学化水平。要增强党领导金融工作能力，努力建设一支宏大的德才兼备的高素质金融人才队伍。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要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确保金融改革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国有金融机构领导人必须增强党的意识，党的领导要与国有金融机构公司法人治理相结合，促进形成良好的现代公司治理机制。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努力学习金融知识，熟悉金融业务，把握金融规律，既要学会用金融手段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又要学会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强化监管意识，提高监管效率。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强烈的历史担当和顽强的意志品格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指引并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朝着“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阔步前进，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其中“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等有关金融工作的各项任务要求既明确具体，又极具前瞻性。我们要集中精力深入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金融思想，加强金融学科体系、话语体系和学术体系建设，尽快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金融监管框架，进一步加大金融改革创新力度，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贡献中国方案，展示中国形象。

（中国社会科学网 2018 年 1 月 14 日）

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全球治理行动框架

张新 胡鞍钢 周绍杰

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的世界地位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按购买力平价 (PPP) 计算,中国 2014 年 GDP 达到 7.6 万亿美元,已经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中国也早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制造业国家 (2010 年)、第一大货物贸易国 (2013 年),国际影响力日益扩大,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关系正发生着历史性变革,出现市场、资源能源、投资“三头”对外深度融合的新局面,无论从市场规模、经济总量、贸易总额还是投资总量来看,中国已经前所未有地走进了世界经济舞台的中心,中国与世界前所未有地产生了两大互动效应:一方面,中国经济的稳定与发展越来越离不开有利的世界经济环境和形势;另一方面,世界经济的稳定与增长也越来越需要中国的贡献。

与此同时,中国正面临着从上中等收入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发展挑战,发展治理的困难复杂性更高、开放性更强。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所面临的下行压力和不少困难,例如产能过剩和需求结构升级矛盾突出,部分地区困难增加,既有经济增长内生性动力不足和自身发展的结构性问题,但也有很多是外部经济形势变化所带来的影响,而且这种外部冲击的负效应也将越来越重要。

因此,无论从中国在当今世界的经济地位,还是从世界形势变化对中国的影响来看,中国的治国方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从国际视角去思考和制定国内的发展战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从经济外交的全局来推动国际发展合作。不仅要打造中国对外开放的升级版,更需要打造更加完善的全球政策协调体系,以更为积极的姿态全面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改善全球经济环境、推动全球经济增长。

习近平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思想来源于中国的发展实践,又成功指导着中国的发展道路,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时代创新。习近平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时代特征,就是在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上,不仅要继续致力于推动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政治建设、文化传承、弘扬创新发展等诸多领域的发展,更要致力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更加积极主动、全面地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这不仅有利于中国的和平崛起,同时也为重塑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贡献中国理念、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力量。

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全球治理理念

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全球治理战略,是我们党在科学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变化、深刻认识新时期中国经济历史性变革的基础上,指导中国经济巨轮“行稳致远”的重大发展思想和理论体系,它明确了新的

历史条件下国家开放发展的战略方向和行动纲领，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要理念、重大举措。这表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机制逐步成熟，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世界影响日趋扩大。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理念。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多次阐述了命运共同体的内涵。2015年9月，习近平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2016年7月1日，习近平在建党95周年庆祝大会上给出全球经济发展的中国方案：“推动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2017年1月，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主旨演讲时，再次提出中国方案，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这不仅是外交主张，更是促进全球合作的发展倡议。“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中国的发展与强大，对其他国家来说是重要的机遇。当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市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将继续给世界各国提供更多市场、增长、投资、合作机遇。

可“一带一路”建设是迄今为止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的互利共赢共同体，它包括60多个国家44亿人口，覆盖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是以“五通”为核心，以战略对接和政策沟通为桥梁，以项目合作和基础设施联通为抓手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其中，中国作为上中等收入国家，不仅通过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以及丝路基金（400亿美元）、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1000亿美元）、金砖开发银行、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商业性资金融通，还设立了“南南合作援助基金”、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为“一带一路”发展提供大量官方发展援助（ODA），包括未来三年向参与“一带一路”的发展中国和国际组织提供600亿元人民币援助，在沿线国家实施100个“幸福家园”、100个“爱心助困”、100个“康复助医”等项目，既实现低收入、下中等收入与高收入国家合作开发现实的特大市场，又将为最不发达国家建设更多民生项目，支持发展中国家落实2015年后发展议程。

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带一路”建设不仅将带动沿线各国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的增长，还将为沿线发展中国家提供基础设施建设、地区安全与健康发展等公共产品，更将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理念在沿线与周边国家生根发芽，成长为推动全球发展的重要思想共识。

“开放中求发展”的新全球化理念。十八大以来，面对更加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特别是全球经济发展低迷，出现“逆全球化”的种种特征，中国积极推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积极推动和深化以发展全球伙伴关系为目标的“新全球化”，为世界各国拨开“逆全球化”的迷雾，为全球经济增长指明“以开放求发展”的正确路径提供了中国理念、中国方案和中国贡献，发挥了经济增长发动机、开放发展稳定器和全球良治新动力的关键作用，体现了深厚的战略定力和世界担当。

首先，对于为何要推动“新全球化”、重构“老全球化”，反对“逆全球化”，习近平向世界明确阐释道，“老全球化”的格局是造成经济长期低迷、全球动能不足，经济治理应对滞后，特别是全球发展失衡，贫富差距、南北差距扩大等突出问题的根源；但“逆全球化”更不是解决现实问题的正途，“让世界经济的大海退回到一个一个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历史潮流的”，“搞保护主义如同把自己关进黑屋子，看似躲过了风吹雨打，但也隔绝了阳光和空气。打贸易战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无论从中国自身发展经验还是从全球经济发展史来看，只有坚定不移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坚定不移地融入世界发展浪潮，“在游泳中学会游泳”，才是实现互利共赢的正确战略抉择。

其次，对于“新全球化”的目标与方向，习近平在不同场合明确提出，第一，“新全球化”坚持创新驱动，以创新为世界各国和全球经济增长提供新动力、新空间；第二，“新全球化”坚持协同联动，以合作为基础推动全球贸易服务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第三，“新全球化”坚持平等合作原则，确保各国在国际经济交往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第四，“新全球化”坚持共享发展，提倡所有人参与、所有人受益，各国要同舟共济，共迎挑战，分享发展机会和利益，建设一个共同繁荣、公平包容的世界。

最后，怎样推动“新全球化”，习近平主席也为世界各国提出了“中国方案”，这就要加强各国宏观政策协调，扩大全球化的正外部性，减少负外部性，维护金融稳定，实现经济全球化进程再平衡；坚持“创新是引领发展第一动力”，创新增长方式，通过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世界经济的平衡、可持续、包容性增长。

“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理念。习近平经济思想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倡导开放发展，不仅开创了共赢主义新型大国外交时代，超越了以往大国发展与世界互动的角色和定位，更是首倡“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理念。

共商是前提，共建是途径、共享是目的。这一理念的提出，意味着中国向世界各国昭示了拓宽合作渠道、加强合作力度的诚意和决心。

首先，中国的国际合作是全面开放的新型国际合作。无论是来自区域性的周边国家还是域外国家，均可以在共同理念的基础上，展开跨国家、跨地区、跨洲际的广泛合作。这不是简单的数目扩大或扩容，而是在特定议题上为实现更多合作、达成更多协议、凝聚更多共识提供更为灵活的机制与平台，从而为推动全球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从“一带一路”倡议到“金砖+”概念，这种合作关系对所有参与各方都具有开放性、平等性和包容性，这就不仅包括了特定国家，还吸引了大量“外围”国家的积极响应和主动参与，从而为国家间合作发展注入新动力。

其次，中国的国际合作是全方位的新型国际合作。尤其是涉及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国都愿意帮助沿线国家改善和修建各类基础设施，使各经济体之间真正能够互联互通，以此促进货物贸易增长、服务贸易增长、直接投资增长，建立和加强沿线各国互联互通伙伴关系，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合作关系。

最后，中国的国际合作是互利共赢的新型国际合作。所有参与方都是基于共赢而非竞争博弈，无论在贸易领域还是投资领域的合作，都秉持互利共赢的基本原则，这就使得无论国家或地区大小、贫富，中国都愿与其开展互利共赢的合作，寻求利益契合点和合作最大公约数。

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全球治理行动框架初步形成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全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面对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世界经济发展进入转型期，党中央制定和考虑宏观经济政策的视角就必须、也必然从国内转向国际，即更加注重“（利用）两个市场、（配置）两种资源”，这已经成为习近平经济思想中全球治理理念的鲜明特色，这不仅体现出重要的政策意义，也成为十八大以来中国全球治理行动框架的重要特征。

党的十八大对全球治理的战略部署明确提出，“中国将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坚定不移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由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中国在经济外

交方面积极作为, 通过将国际机构作为宣传和沟通中国理念、中国政策的平台, 增强了中国全球经济治理的战略主动, 为构建国内政策向国际政策的转化机制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不断为周边国家、国际组织和国际社会提供共赢发展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表 1 “一带一路”与已有双边合作机制的运行情况

名称	时间	活动	内容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2015年11月19日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二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于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	进一步推动各国和各地区发展倡议的对接和互补, 促进“一带一路”倡议与APEC发展议程融合, 带动亚太地区共同发展。
上海合作组织	2015年7月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乌法宣言》发布	成员国支持中国关于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正在积极筹建的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和发展基金也将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新的强大推动力。
博鳌亚洲论坛	2017年3月23	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会召开, 《博鳌亚洲论坛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2017年度报告》发布	报告指出, 亚洲区域“一带一路”建设进一步加速。
中国—东盟博览会	2015年8月	第12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召开	以“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共创海洋合作美好蓝图”为主题, 助力“一带一路”建设。
	2017年5月	第14届东博会将于9月举行	本届盛会将以“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旅游助推区域经济一体化”为主题, 继续发挥中国—东盟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作用, 为“一带一路”建设作出贡献。
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	2014年6月	中阿合作共建“一带一路”专题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共建“一带一路”着眼的是中阿互利共赢的发展大局, 双方加强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贸易便利化、高新领域等方面合作, 有利于资金、技术、资源、市场实现有效对接, 让合作成果更多造福中阿人民。
	2015年5月	第六届中阿企业家大会暨第四届投资研讨会在黎巴嫩贝鲁特举行	就发展中阿经贸合作、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等议题深入地交换了意见。
	2015年6月	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第十二次高官会在埃及开罗阿盟总部举行	会议总结了中阿首次高官级战略政治对话成果, 评估了“论坛2014年至2016年行动执行计划”执行情况并梳理了下一步工作规划。会议重点讨论了中阿合作共建“一带一路”和促进产能合作等议题。
	2016年5月	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第七届部长级会议在卡塔尔多哈开幕	深入探讨“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中阿战略合作”等重要议题, 全面规划未来两年中阿集体合作的重点领域和合作项目, 对促进互利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论坛机制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亚欧博览会	2016年9月	第五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乌鲁木齐举办	“全新升级版”的中国—亚欧博览会, 为“一带一路”注入了新活力, 成为沿线国家共享发展机遇、完善治理体系的重要平台。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2017年5月	第一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中国方案”将首次引领国际合作, 成为影响范围最广、程度最深的国家间合作计划, “一带一路”将从地区合作升级为真正的国际性合作计划。

“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领”, 十八大以来通过积极倡议和设计《金砖国家创新合作行动计划 (2017-2020) 》 (2017 年)、《金砖国家创新合作行动计划 (2017-2020) 》 (2017 年)、《汉堡行动计划》 (2017 年)、《2017 年二十国集团普惠金融行动计划》、《G20 促进增长的气候和能源汉堡行动计划》、《杭州行动计划》 (2016 年)、《二十国集团创新增长蓝图》 (2016 年) 等一系列跨国合作行动计划, 中国的国际政策协调通道正在逐渐多元化, 中国的国际政策合作伙伴不断扩大, 中国的国际政策协调机制正在逐步成熟, 这也意味着, 中国正从对外开放走向全面开放、从局部参与走向全面参与世

界经济治理。

中国的国际政策协调通道逐渐多元化。习近平始终强调，全球经济治理应该以开放为导向、以合作为动力、以共享为目标，鼓励各方积极参与，共商规则、共建机制、共迎挑战，最终实现共赢发展的目标。

当前，中国正积极利用各类国际经济合作组织，不断推动经济政策的国际协商化、协同化、一体化，已经形成了以合作组织与高峰论坛为主体、双边合作机制为基础、区域合作协定为构架的多元化国际政策协调通道。例如，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直接参与政策合作协商的国际组织就包括亚太经合组织 (APEC)、上海合作组织等，直接推动政策倡议和实施的论坛包括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金砖国家峰会，以及一系列涉及社会各界、不同领域的分论坛 (见表 1)；杭州 G20 峰会更是举办了工商峰会 (B20)、劳动会议 (L20)、青年会议 (Y20)、妇女会议 (W20)、智库会议 (T20)、民间社会 (C20) 等配套活动，为推动“中国倡议”成为“世界方案”构筑起广泛的国际交流合作平台。

中国的国际政策合作伙伴规模不断扩大。提高国家影响力既是强国目标之一，也是当前全球经济治理的重大任务之一。2012~2017 年间，中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虽然降为 7.33%，但经济增量占世界比重 15.36% 上升至 21.35%，GDP 总量和对世界经济的增长贡献都超越美国跃居第一位。与此同时，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政策领域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最集中的表现就是国际政策的合作伙伴数量不断增长，“朋友圈”不断扩大。

十八大以来，中国“主场外交”的规格不断提升，中国倡议或参加的高水平国际论坛与参会国家数量出现“双增长”。据不完全统计，2012 年以来，仅我国主办的高级别国际会议就超过 35 场，年均参会国家 (地区) 和组织达到 224 个 (见表 2)。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以“世界互联网大会”为例，其中一半以上是中国的首倡性、定期性、长期性国际峰会，论坛规模、参会代表的级别不断提高，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

今天的中国，已同 70 多个国家和诸多地区组织建立起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事实证明，随着中国国际政策协调通道的逐渐多元化，“朋友圈”越来越大，中国的全球经济治理方案越来越得到大多数国家的认同、响应和支持，中国的全球治理的理念和行动不仅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而且开枝散叶，让全世界参与其中。

中国的国际政策协调与实施机制逐步成熟。习近平指出，“结构性改革必须有国际视野”。当前，我国不断加快统筹国内国际的战略布局与政策措施，“国内政策 (战略) ——国际倡议——国际共识——实施方案”的国际政策协调机制正在逐步完善。以“一带一路”建设为例，理念形成、国内政策制定、国际政策协调、国内国际战略协同，到实施方案的推动，中国的国际政策协调机制已经形成了清晰的发展路线图 (见表 3)。

表2 十八大以来中国主办的重要国际会议或论坛

时间	会议名称	地点	参会国家（地区）及组织（累计数）	论坛性质
2017年9月	第二次“1+6”圆桌对话会	北京	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国际劳工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金融稳定理事会	定期会议
2017年9月	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	厦门	“金砖五国”+五国	
2017年6月	第十一届夏季达沃斯论坛	大连	90多个国家各界领袖	定期会议
2017年5月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北京	130多个国家	定期会议
2017年3月	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年会	海南博鳌	48个国家和地区	定期会议
2017年			284	
2016年11月	第三届互联网大会		120多个国家和地区，20多个国际组织	定期会议
2016年10月	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	澳门	7个国家	定期会议
2016年9月	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	浙江杭州	28个国家，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国际劳工组织、金融稳定理事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2016年7月	第二次“1+6”圆桌对话会	北京	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国际劳工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金融稳定理事会	定期会议
2016年7月	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2016年年会	贵州贵阳	73个国家和地区	定期会议
2016年4月	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五次外长会议	北京	32个亚信成员国	
2016年3月	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年会	海南博鳌	62个国家和地区	定期会议
2016年			353	
2015年11月	第二届互联网大会	浙江乌镇	120多个国家和地区，20多个国际组织	
2015年11月	第四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	江苏苏州	16个国家和地区	
2015年6月	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2015年年会	贵州贵阳	50多个国家和地区	定期会议
2015年6月	第三届中国—中亚合作论坛	山东日照	5个国家和地区	
2015年3月	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	海南博鳌	15个国家和地区	定期会议
2015年1月	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	北京	4个国家和地区	
2015年			230	
2014年11月	第一届互联网大会	浙江乌镇	100个国家和地区	定期会议
2014年11月	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北京	20个国家和地区	
2014年9月	世界经济论坛2014年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斯论坛）	天津	90多个国家	定期会议
2014年7月	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2014年年会	贵阳市	联合国相关机构及国际组织	定期会议
2014年6月	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	北京	阿盟21个成员国	
2014年5月	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	上海	4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	
2014年4月	博鳌亚洲论坛2014年年会	海南博鳌	9个国家	定期会议
2014年			286	
2013年11月	第二届中国—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合作论坛	广东广州	9个国家	
2013年11月	第四届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	澳门	7个国家	定期会议
2013年7月	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2013年年会	贵州贵阳	5个国家	定期会议
2013年7月	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	重庆	16个国家和地区	
2013年5月	中阿合作论坛第十次高官会	北京	阿盟21个成员国	
2013年4月	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	海南博鳌	30多个国家	定期会议
2013年			88	
2012年9月	第四届中国阿拉伯友好大会	宁夏银川	20多个阿拉伯国家及阿拉伯联盟	
2012年7月	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	北京	联合国、50个非洲成员国、非洲联盟委员会、部分非洲地区和国际组织	
2012年6月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北京	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5国	定期会议
2012年4月	博鳌亚洲论坛2012年年会	海南博鳌	30多个国家	定期会议
2012年			108	

值得注意的是，在战略制定和政策实施的微观层面上，中国在主动利用已有国际机制的同时，积极推动国际组织的机制建设和改革，建立了“协调工作组——形成成果清单——落实合作协议——推动合作项目”的实施机制，使得合作论坛与高峰会议真正成为推动中国倡议和中国方案的“行动队”，而不是“清谈馆”。例如，杭州 G20 峰会上，中国继续加强二十国集团以峰会为引领、协调人和财金渠道“双轨机制”为支撑、部长级会议和工作组为辅助的架构，有力支持了《G20 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促进 G20 成员在数字经济培训和研究领域积极开展合作，并与国际组织及其他团体积极互动，共同推动全球数字经济快速健康发展。

中国的国际政策协调通道逐渐多元化，中国的国际政策协调机制逐渐成熟，大大提升了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大大提高了中国参与国际经贸谈判和规则制定中的能力，大大推动了“中国建议”“中国方案”成为“世界方案”的制度进程。由此，当中国在世界全球化逆流之中挺身而出，主动倡导包容、公平、可持续的“新全球化”，高举“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服务便利化”三面大旗时，很快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和广泛响应，“一带一路”倡议也为越来越多的域内外国家所认可和参与，从而使中国真正有可能成为推动此次全球化进程引领者，实现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的最大旗手，不仅维护和拓展了我国的发展利益，也为实现联合国 2030 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s) 作出了世界贡献。

表 3 “一带一路”战略推动进程

时间	发展阶段	事件
2013年9月	理念形成	习近平在出访哈萨克斯坦时首次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概念。
2013年10月		习近平在出访印尼时提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
2013年11月	国内政策制定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2014年4月		商务部设立欧亚司，主要在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负责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等12国的经贸关系工作。
2014年6月	国际政策协调	习近平在中阿国家论坛上提出了“1+2+3”的合作框架，其中1代表将能源合作作为基础，2代表促进基建投资和国际贸易，3代表将核能、航空和新能源作为突破口。
2014年10月	国内战略布局	发改委牵头起草的“一带一路”规划递交国务院审议。
2014年11月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发改委、财政部和央行提出了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绸之路基金。
2014年11月		习近平宣布中国政府将出资400亿美元投资设立丝绸之路基金。
2014年12月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重点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一带一路”又成为国家三大战略之一，其中“一带一路”为对外战略。
2015年3月	国际战略沟通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在博鳌论坛期间发布。
2015年11月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八次会议指出，坚持将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与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和国家对外战略紧密衔接，逐步构筑起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
2016年2月		香港特区政府设立“一带一路”督导委员会及专项办公室，负责推动研究工作，统筹协调相关政府部门及贸发局、旅发局等机构，以及与中央部委、各省市市政府、香港的业界、专业团体和民间团体联络。
2016年3月	统筹国内、国际大局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将“一带一路”列入“十三五”时期主要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部分。
2016年11月	推动成为国际共识	在第71届联合国大会上，“一带一路”倡议被写入联合国决议。
2017年2月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
2017年1月	制定并推动国际实施方案	国家发改委同外交部、环境保护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农业部、人民银行、国资委、林业局、银监会、能源局、外汇局等13个部门和单位共同设立“一带一路”PPP工作机制。
2017年5月		中国举办第一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形成270项成果清单。

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历史使命：构建更加完善的全球政策协调体系

中国的对外开放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对外开放局面正面临着新的转折点，过去是招商引资为主，现在是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过去主要是扩大出口换取外汇，现在是市场、资源能源、投资都离不开国际市场；过去只是被动适应国际经贸规则，现在则要主动参与和影响全球经济治理。

可以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视角逐步从国内转向国际，宏观政策更加善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更加善于利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这不仅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时代特征，同时也是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政策框架的一项重要指导思想，而如何进一步构建更加完善的全球政策协调体系，更是新时期习近平经济思想与政策的历史使命。

“我国对外开放的水平总体上还不够高，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还不够强，应对国际经贸摩擦、争取国际经济话语权的能力还比较弱”，如何进一步扩大中国经济影响力，加强国际特别是大国间合作机制，扩大全球经济事务领导权，打造与中国在全球经济舞台中心地位相匹配的宏观政策，将是未来中国宏观经济调控和国际宏观政策协调的重要方向。

其一，统筹“两个大局”，制定中国全球发展战略。要以推进“一带一路”为契机，加快实施全面“走出去”战略。从“中国”发展战略到“世界”发展战略，就需要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出发点，从主要配置国内资源转变为同时配置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从主要开发利用国内市场转变为同时开发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积极拓展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空间，不断提高发展潜力，不断增强国际竞争力。

其二，推动多边双边和自贸区发展，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积极参与国际谈判，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服务便利化。坚持“引起来”和“走出去”相结合，更加注重“走出去”。扩大内陆沿边开放，提升开放层次维度。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成为新一轮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引领者。

其三，推动包容和联动式发展，扩大与南方国家的互利共赢合作。进一步推进国家开发性和国际金融机构为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提供金融贷款，参与和引领全球和区域大型基础设施网络建设，为中国创造更好的对外投资环境，提供更多的对外投资机会，特别是通过投资相关国家的基础设施、市场环境、人力资源开发等，为推动“一带一路”倡议起到示范性、长远性作用。

其四，提升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能力。从 G20 峰会到达沃斯论坛，从“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到第九届金砖国家峰会，随着全球性议题增多、世界经济格局变化和全球治理难度加大，中国正在以越来越积极的姿态参与全球气候变化、国际金融体系、国际贸易体系等全球治理议题，倡导开放包容、平等互利的合作理念，推动完善公平合理的国际治理体系。

结语

习近平经济思想全球治理框架的形成深刻说明，全球经济治理能力是一国经济“硬实力”与影响“软实力”的结合，两者相辅相成，“硬实力”是“软实力”的基础，但“软实力”对硬实力的提升也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十八大以来，在中央的战略部署指引下，中国牢牢把握战略机遇期，加速追赶和超越世界最发达的国家即美国。无论是以 GDP、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等经济指标来看，中国对美国经济“硬实力”

的赶超是快速、持续、全面的。但以全球治理能力的角度来看，中国在世界经济影响的“软实力”方面与美国还存在一定差距，但随着中国的国际政策协调通道逐渐多元化、合作伙伴持规模续扩大、协调与实施机制逐渐成熟，这种差距也在迅速缩小。

需要看到，经济“硬实力”向影响“软实力”的转化具备一定的客观需要条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国家的经济意愿（特别全球战略意图）能否真正惠及他国、造福他方，这决定着其他国家的“人心背向”，也是一个国家经济实力能否转化为其全球经济治理能力的关键。

总之，21 世纪的头 20 年，对中国而言，是一个“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虽然在“硬实力”的比拼上美国与中国出现此消彼长的趋势，但美国的全球经济治理能力和国际影响位置仍然无人可及。然而，经过五年时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协调积极构建基于共赢主义的新型国际关系，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导的党的执政方略更加全球化，大大增强了中国的全球经济治理能力，推动了国家经济硬实力和治理软实力的大幅跃升，在全球经济治理方面，中国已经前所未有地进入世界舞台中心，也有实现这个目标的信心和能力。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7 年第 20 期）

不断巩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中央党校经济学部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思想，其核心内涵，就是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范畴，是马克思主义特有的经济社会范畴，是马克思主义认识和改造社会的核心理论概念。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论述，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的思想。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要不断巩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只有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才能筑牢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的物质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重要思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要不断巩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一思想，是对我党基本路线核心内涵的更为清晰深刻的阐述和更进步的发展。

按照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无论什么社会形态，经济基础都是一个社会的根本。经济基础同样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当代中国社会形态的根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仅仅是我国发展某一阶段或某一时期的任务，而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任务。因为只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才能持续不断地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经济基础。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根本上说，没有扎扎实实的发展成果，没有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空谈理想信念，空谈党的领导，空谈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空谈思想道德建设，最终意识形态工作也难以取得好的成效。只要国内外大势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不能也不应该改变。这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的根本要求，也是解决当代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本要求。”由此可见，是否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否扎扎实实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在当代中国，可以成为区分科学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个分水岭。

习近平总书记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一些认识误区作出了鲜明的纠正：“社会上有一些人说，目前贫富差距是主要矛盾，因此‘分好蛋糕比做大蛋糕更重要’，主张分配优先于发展。这种说法不符合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党的十八大提出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是为了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不要发展了，也不是要搞劫富济贫式的再分配。我们提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就是为了更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为人民群众生活改善不断打下更为雄厚的基础。”因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我们进行新的伟大斗争，是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进入更高层次发展阶段后，在如何更好推动中国发展上出台新的战略举措，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雄厚的经济基础。这就是，一切工作要向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聚焦。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本质规定性

在不同的社会形态和不同的历史时代，经济基础的社会属性和历史属性也是有着本质的不同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社会形态下，其经济基础的本质规定性，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其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根本宗旨：“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诉求就是希望收入水平、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就是能够更好地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就是能够有更多的获得感。党的十九大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提到党的根本宗旨的高度来强调：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

以往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都是以剥削阶级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社会与这些社会的本质区别就是，以人民为中心。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本质属性。这一本质属性，客观上是由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决定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此作出了新的科学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

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主要矛盾决定了我们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精会神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实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上，首要的就是要不断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与不断强化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人民群众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主体，也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主体，同时也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主体。最充分地调动人民群众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积极性，最充分地尊重和满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诉求，这既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本质属性所在，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断巩固发展的最根本的动力源泉。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不断巩固发展，会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物质利益的不断满足又会更大程度地激发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使得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更加雄厚，使得社会财富的源泉更加充分地涌流。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全面巩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结构，全面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其面临的任务也是多层次多方面的。

第一，必须把大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放在首位。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一个社会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必须依靠不断改革创新，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

会活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比资本主义制度更有效率，更能激发全体人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能为社会发展提供有利条件，更能在竞争中赢得比较优势，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体现出来。人民群众是社会生产力的主体。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归根到底是为了不断增加人民群众的福祉。同时，人民群众积极性的调动和发挥，又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源泉。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两者是一致的，是相辅相成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就必须把大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放在首位。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调动起来了，社会生产力持续不断地得到解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才能不断地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道路、事业，才能得到持续不断的、强大的物质力量的支撑。

第二，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社会生产关系是一个社会经济基础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社会生产关系，标志着走什么样的道路。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要科学、准确、坚定地把握好我们要走的道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在道路规定性上，我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根本性的成就就是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基本经济制度也就是当代中国的基本的社会生产关系构成。对这一社会生产关系的基本规定性，最清晰准确的阐述就是，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必须从多个层面提出鼓励、支持、引导非公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的改革举措。在功能定位上，明确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在产权保护上，明确提出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在政策待遇上，强调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鼓励有条件的私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一阐述说明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条件下我国社

会生产关系的基本构成，即是一种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存在、共同发展的经济形态。这一社会生产关系形态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特征之一。我们要不断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就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

第三，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任何社会形态，在其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基本规定性确定的同时，也要确定其具体的实现形式，即解决经济运行体制和机制问题。改革开放的实践使得我们找到了这一体制和机制，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机制。习近平总书记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给予了高度评价：“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这是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解决了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长期没有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一重大问题，就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发展的具体实现途径和实现形式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经济上的一个极为突出、也极为成功的特征。当代中国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完善，都需要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实现。因而，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就成为不断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重要任务。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有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也会对各个领域的改革，尤其是对上层建筑的改革发挥积极的牵引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对此作了深入和明确的阐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主要涉及经济体制改革，但必然会影响到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要使各方面体制改革朝着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方向协同推进，同时也使各方面自身相关环节更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出的新要求。”

（《学习时报》2017年12月6日）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新时代经济建设的总纲领

刘志彪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也没有变。因此，全党要牢牢把握这个基本国情，牢牢立足这个最大实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快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宏伟奋斗目标，坚定不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十九大据此提出，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下，我们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建设的一个总纲领，就是要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这是十九大报告中基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创新性地提出来的一个突出的、具有建设性的重要范畴。它的内涵和建设标准是什么？为什么现阶段要提出这样的经济建设总纲领？应该如何去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现代化的经济体系首先坚持质量第一、效率优先的方针；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质量、效率和发展动力的三大变革；要建设一个四要素协同的产业体系，即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四者协同的现代产业体系；要建设能够支撑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经济体制和机制，让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

一、现代化经济体系：内涵和建设标准

过去，我们曾经提出过实现“经济现代化”目标，或建立“现代产业体系”等要求。前一范畴经常与国防现代化、科技现代化等并列或对照使用，主要是指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换、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变革的历史和动态过程。后一范畴则是在产业层面上，特指现代元素比较显著的产业构成。这在经济发达国家，主要指工业技术先进、现代服务业发展比较充分的产业构成；而在发展中国家，则主要是指工业化进程启动或加速成长、第三产业所占比重稳定上升的产业构成。显然，十九大报告新提出的“现代化经济体系”这一概念，在一定程度上融合了“经济现代化”和“现代产业体系”这两个概念的内涵。

与上述两个概念不同的地方在于，“现代化经济体系”不是指变革的历史和动态的进程，而是与构成现代化强国的其他要素(如现代化社会体系、现代化生态系统、现代化法治体系等)对应，指一种可以定性或定量描述的经济水平发展的状态、目标和结构；它不仅是针对产业构成、产业结构而言，

也不仅是用此来描述产业高度化水平，而是指整个国家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经济系统，在发展总量和速度、发展水平和质量、发展结构和要素、空间布局的性状、体制机制运行、开放发展程度等诸多方面的现代化水平和状态。相对于全面建成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来说，它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最重要的最基础性的建设子目标和内容。为了实现这个子目标，必须以建设现代产业体系为重要的物质基础。

根据十九大报告精神，新时代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本建设标准和框架，主要应该由以下几个方面构成：

一是经济总量和发展速度。中国已成为全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只要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 5% 左右，到 2050 年左右，中国人均收入就能达到世界现代化国家的平均水平，我国的经济总量就会处于世界第一的位置。

二是发展水平和发展质量。我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然而，中国可以在衡量发展水平和发展质量的其他指标方面奋起直追，领先世界。如在教育年限、预期寿命等方面，中国的进步都十分迅速。

三是现代化产业体系和结构。在作为发展中大国经济的语境下，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我国是指要全面地构建比较稳固的现代农业基础，比较发达的制造业尤其是高等级的装备制造业，以及门类齐全、迅速发展的现代服务业。总体要求是技术进步不断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这样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物质基础。

四是现代化空间布局结构和协调程度。指国土资源利用效率较高、要素密集程度较大、生态容量适度、城市群落连绵、区域发展差距较小的生产力布局结构。

五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体制机制。并不是西方当代的市场经济体制，才是现代市场经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主要特征是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市场和政府的“两只手”都要起作用，这是中国发展的优势所在。

六是高水平的开放经济体系。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是全方位立体开放的经济体系，是深度加入全球分工体系、与世界经济之间有着良性循环关系的经济，不仅可以输出商品和要素，而且也可以吸收商品和要素，但绝不是依赖型的输入型经济(如技术依赖度比较小)；不仅可以引进来，而且可以走出去；不仅可以向东开放，而且可以沿着“一带一路”向西向南开放。

二、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方针和战略意义

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这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总方针的提出，是十九大对过去中国发展模式进行深刻反思的结果。众所周知，过去的赶超战略取得了令全球瞩目的中国经济奇迹，但同时也留下了一些急需要解决的、突出的、长期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结构性失衡”问题，表现为经济运行中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现象。

进入新时代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为此必须在战略上从追求增长速度转型为追求质量经济体系，实现经济速度与民生幸福的双重追赶。这一战略转变趋势叠加我国人口提前老龄化的社会环境，意味着中国发展环境和条件将发生巨大的变革，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经济现象，就是可能会出现以要素价格不断上扬为基本特征的经济趋势。如

果这种成本上升的趋势不能为生产率上升速度所消化，不能从依赖于低成本比较优势转向创新驱动、提高生产率和附加价值的竞争优势，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动力将有所衰减，经济运行将可能出现滞胀格局并陷入发展的陷阱。*(刘志彪：《为实现现代化打下坚实产业基础》，《人民日报》2016年8月25日理论版。)

为此，我们需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通过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来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型，全面提升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这是跨越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关口的迫切要求。

第一，只有努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才能改变长期以来在赶超型旧体制下形成的速度、数量偏好的粗放型发展特征，才能使供给结构较好地适应需求结构的快速变化和不断升级的趋势，才能真正地化解过剩产能、降低经济杠杆，加快振兴实体经济。

第二，只有努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大力推进结构优化和产业结构调整，坚持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才能在符合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对美好生活需要的领域，培育新的增长动能和新增长点，构建现代产业新体系，同时使传统产业得到更新改造、焕发生机，使落后产业得以淘汰出局。

第三，只有努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通过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鼓励各级政府进行制度创新和高质量的制度供给，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和机制，才能不断地解决发展中遇到的新问题，不断增强我国经济的创新力和竞争力。

第四，只有努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才能抓住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给我国带来的新的发展机遇，在高水平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基础上，利用中国庞大的内需虹吸全球先进生产要素，尤其是人力资本和先进技术，发展创新经济，才能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三、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新常态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面对国内外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抓住机遇奋力前进的主动作为。积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是边际投入效率递减背景下，迎接新时代经济变革趋势所提供的战略机遇的不二法门。*(杨伟民：《适应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宏观经济管理》2016年第1期。)因为，在这个背景下，只有努力地向结构调整要速度、向结构变化要质量，向结构转换要效益，才能解决新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推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中的质量、效率、动力的三大变革。从供给侧看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主要是供给结构、质量体系与不断升级的社会需求结构之间，存在着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说的“重大的结构失衡”，从而导致产能过剩、效率低下和运转不灵。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纠正扭曲的供需错配，提高产出的质量和效率，从而缓解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促进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重点是要解决发展中存在的结构性、体制性和素质性的矛盾和问题，在具体的路径和方略上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要重点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抑制以炒房为代表的虚拟经济过火、过旺的不

良态势。实体经济振兴要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避免过度追求数量的倾向，增强我国经济质量的优势。

二是要把握科技进步的基本方向，重点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并形成经济发展新动能。

三是要运用一切手段鼓励传统产业优化升级，鼓励企业在经济周期的底部阶段进行大规模的技术改造，对购进国内外先进技术设备的企业，可以按一定的比例给予税收的优惠和贴息贷款的支持等等。

四是要加快发展和迅速提高现代服务业的水平。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就是指人民群众“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显然，这些内涵更多与发展现代服务业有关。这就把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到了极其重要的政策高度。

五是要重点促进产业集群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打造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企业以集群这种组织方式发展，同时产业集群加入全球价值链，是当今中国产业发展的重要特征。过去的问题是我们加入的是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产业集群的发展整体上组织程度不高。中国未来产业集群升级的方向，就是制造环节的精细化以及向微笑曲线的两端攀升，并且在这个过程中通过竞争和收购兼并，逐步形成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六是要重点强化水利、铁路、公路、水运、航空、管道、电网、信息、物流等基础设施网络建设。这除了可以实现稳增长的目标外，更重要的是可以为产业发展提供更多、更持续的“外部经济性”。

七是坚持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优化存量资源配置，扩大优质增量供给，实现供需动态平衡。

八是要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同时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

四、建设四者协同的产业体系：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物质基础

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四个要素协同的产业体系，是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物质基础。在这四个要素的关系中，实体经济是纲，是目标，是导向，任何脱离发展实体经济轨道、使虚拟经济自我循环的不良倾向，都会伤害国民经济，都需要纠偏；科技创新是实体经济发展的第一驱动力；现代金融则是其健康持续发展的血液系统；人力资源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第一生产力。

建设四要素协同的产业体系的这个愿景，除了吸收了内生增长理论的精华外，还把它和发展实体经济有机地糅合在一起；提倡现代经济增长更多地要发挥高级先进生产要素的协同作用而不是去孤军奋战；鼓励由金融支撑的创新驱动增长；鼓励把过去在全球价值链底部进行国际代工的汗水经济转变为人力资源驱动型的智慧经济。

关键在于如何实现这种协同。我国现实发展中的问题是实体经济不实，虚拟经济太虚，后者发展有脱离前者的不良倾向。同时科技创新对产业发展支撑力度不够，往往呈现为“两张皮”的不良格局。未来实现要素之间的联动发展，一方面要通过金融创新供给更多的优质资产，缓解资产荒，平抑资产价格；另一方面要通过技术创新，吸收更多资本流入实体经济，为金融领域供应更多可投资的资产。

这些工作都需要第一生产力——人力资源的源源不断的支持。

之所以要实施上述的要素协同方式，是因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变化了，这一变化对经济政策提出了转型的要求。过去我国是资本不足和商品短缺，国家宏观政策的导向是要千方百计地增加储蓄率，扩大投资规模和增加生产能力，增加市场的有效供给；进入 20 世纪末后，我国已经完全摆脱了双短缺经济的特征。尤其是最近十多年来，国家的发展任务不再是要努力增加生产能力，而是联动解决资本和商品的双过剩、同时千方百计地增加优质资产的供给。这要比仅增加储蓄、扩大供给问题要复杂得多。

一方面，我们要引导企业在实体经济领域加快技术创新和优化供给结构，努力淘汰落后产能，或者通过培育潜在市场消化过剩产能，或通过深度加入全球化输出过剩资本；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在虚拟经济领域强化金融创新，增加优质资产的供给，满足居民在收入提升之后不断增长的投资理财需要，从而解决由资产短缺所带来的资产泡沫问题。

这两个任务其实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即宏观经济政策可以通过资本市场的发展，引导供给结构的优化调整，从而化解实体经济领域的过剩产能。反过来，对虚拟经济发展中资产价格过高等问题，也可以通过实体经济的发展来平抑和调节，如通过鼓励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为资本市场提供更多的资产配置的选择机会。这些都是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所面临的新问题。

五、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体制机制支撑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支撑即“三个有”的经济体制：市场机制要有效、微观主体要有活力、宏观调控要有度。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构建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制度保障。实践证明，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都主要来自于对旧有的不适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和机制的大胆改革和创新。改革政府与市场关系是形成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要路径。

一是要更好而不是更多地发挥政府作用，要通过负面清单、责任清单的管理，适当地减少干预，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在做最有效的事情上；“更好”的标准是不缺位、不越位、不错位。

二是要把“放手”当作最大的“抓手”，明确政府的权力边界，对权力清单外的事务要多做“减法”。

三是要“放手”不是“甩手”，为市场活动制定规范，并充当监控者和仲裁者，纠正市场自身的失败，在非赢利性活动中发挥主体角色，为市场发展提供充足的外部经济性。

具体的重点任务，主要在三个层次上：(1)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2)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垄断规定和做法；(3)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健全财政、货币、产业、区域等经济政策协调机制。

六、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若干重点问题

新时代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构建的基本路径和基本方略，需要我们结合中国国情和客观实际把它们具体化为行动纲领。在这个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关键问题主要有：

1. 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第一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塑造更多

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性发展”。选择把创新驱动发展作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第一动力和战略支撑后，我国在全球经济竞争舞台上的角色、功能和地位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在角色上，会由追赶者变为赶超者，甚至变为领跑者；在功能上，会由技术标准的遵守者和跟踪者，变成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在市场地位上，将由追随者和弱势者，变成主导者或竞争者。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掌握新技术的源头，必须经历时间更长、花费更多、风险更大的基础研究和产业化过程。为此，必须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教育和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的重大突破。同时，要在科技成果的产业化转化方面，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知识产权法和企业家精神的作用。

2. 振兴乡村经济。这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础环节。“三农”问题任何时候都是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解决不好，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加快推进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无疑是达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要求的有效方法和路径。十九大报告在三农方面的一个重要的政策亮点，就在于提出了要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必须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3. 区域协调发展。这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空间支撑结构。中西部地区发展不充分，这既是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需要花大力气去纠正的问题，也是进一步发展的潜力所在。区域协调发展应该根据各区域发展的实际情况，分门别类制定差别化的经济政策：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要用各种扶持政策促进其加快发展；对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的振兴，需要通过深化改革，重塑激励机制和发展动力，使其焕发青春活力，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对东部发达地区，则应要求其尽快进入创新引领发展的轨道，率先实现地区优化发展，率先启动进入基本现代化的第二步战略。未来应根据“时空压缩、增加密度、减少分割”的经济地理重组原则，鼓励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和边远小城镇人口的市民化进程。

4. 全方位开放。它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良性循环机制。开放带来了中国的全面进步，过去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取得了巨大的红利。当前新一轮基于内需的全球化浪潮正在兴起，中国要利用自己的内需优势，形成发展的自我强化机制和良性循环机制，吸收全球先进的高级生产要素，为我国发展创新经济服务。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不是关闭，而是越开越大，主要是：(1)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引进来和走出去，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2)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3)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4)通过建立和完善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促进国际产能合作，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网络，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邹薇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报告首次提出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这是对于我国未来经济发展所需要建立的经济体系框架的最新表述，也是针对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所面对的国际国内经济环境而做出的重要部署。报告非常清晰地阐述了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面临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三大关口，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深刻内涵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不断提高我国经济质量优势，是针对新时代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提出的经济发展方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一项宏大而艰巨的工程，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涵和实践指南。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建设现代化的产业体系。十九大报告提出“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这是我国首次明确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路径和目标。世界经济强国和国内发达地区发展规律表明，当经济发展进入“中等收入水平”阶段之后，先进制造业的快速发展构成各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实力的支柱，是实现经济腾飞的最佳切入点和突破口，抓住了先进制造业，就抓住了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表明，中国已经到了必须通过结构转型升级和建立现代化产业体系来推动发展的新阶段。

解决好产业结构升级问题，必须准确把握我国产业结构调整 and 升级的新特征。其一，我国已进入工业化深化发展阶段。一方面，消费结构正逐步从基本需求为主向较高端消费品升级，必然带动重工业和高附加值、高加工度、高技术含量的制造业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劳动密集型行业和非技术密集型行业仍然是中国工业的主体。其二，技术进步成为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动力。近年来，我国技术密集型行业的企业数、增加值、总资产、利润总额、从业人员占整个工业的比重等出现了明显上升趋势，技术进步带动了新产品开发、先进生产工艺的采用，还带动了节能减排效益的提高。其三，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新型产业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不断提高。近年来，电子信息产业的产品销售收入、工业增加值、利润总额、进出口总额等始终保持 20% 左右的高速增长势头，工业设计和研发信息化、生产装备数字化、经营管理网络化的水平不断提高，信息产业的发展不仅改变了工业结构，而且给整个产业领域和城市基础设施等领域带来巨大变革。其四，东部工业增速明显放缓，而中西部地区生产增势和盈利状况整体良好，我国工业生产的重心正向中西部转移。中西部地区工业的企业数、

增加值、资产额、利润总额占整个工业的比重均持续上升。目前东部地区资本相对饱和，土地、劳动和能源等生产要素供给趋紧，工业增速趋缓，产业升级压力明显加大；相比之下，中西部地区具有资源充沛、市场广阔、企业经营成本较低的比较优势，在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应成为推动工业转型的重要力量。

因此，我国推动产业升级转型和建立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具有紧迫性、必要性，而且具备了坚实的基础和条件。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关键性作用，更好地引导资源配置到效率更高的领域中去，推动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四位一体协同发展，建立更加平衡和高效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必须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上下功夫。十九大报告要求“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是我国在中央文件中首次采用“全要素生产率”概念，也从总体上提出了我国高效率推进产业发展、重塑经济发展新动能的目标。

所谓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又称为“索罗余值”，最早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索罗（Robert M. Solow）提出，是衡量单位总投入的总产量的生产率指标。在索罗开创的“增长核算”中，TFP被视为长期经济增长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全要素生产率并非所有要素的生产率，“全”的意思是经济增长中不能分别归因于有关有形生产要素（包括资本、劳动、土地等）增长的其他部分，因而全要素生产率只能用来衡量除去所有有形生产要素以外的纯技术进步的生产率增长。在索罗创立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TFP通常被简称为技术进步率。但需要明确的是，这里的纯技术进步包括知识、教育、技术培训、规模经济、组织管理等方面的改善，并不局限于有形的效率、更高级的资本设备、技术含量更高的劳动、肥效更大的土地等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

TFP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解释各国经济长期增长的绩效。据世界银行数据，1997~2013年间美国TFP的年均增速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中最高，美国的劳动生产率（以劳均GDP水平计）在OECD国家也是最高的。相比之下，拉美经济的持续停滞主要归结于TFP的下滑。20世纪80年代至今，拉美地区经济增长出现比较明显的停滞和下滑，然而分析表明，劳动投入对拉美经济的贡献度是基本平稳或略有下降的，资本积累不足导致经济增长下降大约0.6%，因此，拉美经济的停滞和下滑主要不是由于生产要素积累的下降，而是源自TFP的下降。

传统生产要素（资本、劳动）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会由于收益递减作用而递减，因此，要推动经济长期增长，就必须不断推动创新（包括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组织创新、产业结构升级等），发掘出能够带来收益递增的新的增长动力，这样才能抵消、甚至超出传统生产要素的收益递减效应，从而推动长期经济增长。以煤、铁和机器化大生产为主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以电气技术为核心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及以计算机技术、互联网技术、移动终端技术、智能制造技术为核心的新的工业革命等，都以迅捷的、遍历的方式影响了整个制造业乃至世界经济，带来了TFP的提高。而发展中国家，包括目前的“金砖国家”，在其长期增长中面临的最大困境或门槛就是“创新瓶颈”和增长动能不足。如果能够积极有效地应对“创新瓶颈”，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塑造经济增长新动能，就能够突破“玻璃屋顶”，实现向高收入经济的跨越。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表明，中国工业已经到了必须通过结构转型升级、强化实体经济来推动发展的新阶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盲目追求GDP扩张转变为更加注重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效益水平和经济增长质量；转变见物不见人的旧发展模式，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其要义是更加注重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让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经济发展过程、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具体到产业发展方面，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构建现代产业发展的新体系，为此必须加快改

造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附加值、低效率的传统制造业，加快发展低投入、低消耗、低污染、高附加值、高效率的先进制造业；同时，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的产业增长点，形成产业发展新动能。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十九大报告把全方位地推进创新，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我国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在许多重要的科学技术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创新是引领我国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为此，必须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必须加强应用基础研究，拓展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突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必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强对中小企业创新的支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必须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要让创新贯穿经济发展的各个环节、各个领域，为建设科技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网络强国、交通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提供有力支撑。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贯彻落实绿色发展理念。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因此，必须加快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体系和制度保障；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发展绿色金融，发展绿色环保技术；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落实减排承诺，在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呵护好绿水青山。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建立全面开放新格局。十九大报告指出，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十九大提出了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战略部署。当前，中国已经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逐步健全，对外贸易、对外投资、外汇储备稳居世界前列。为此，必须更加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努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必须促进自由贸易区建设，并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必须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以开放促进改革，以开放促进创新，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网络，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发展“三大变革”

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建立现代化的产业发展新体系，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提高有效供给、高质量供给，加快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关键举措。十九大报告在阐述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时，首先强调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能否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继续取得实质性进展，直接关系到我国能否实现质量、效率、动力三大变革，直接关系到“十三五”期间、乃至未来中长期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也关系到如何建立增速更稳健、结构更优化、效率更高、质量更好、竞争力更强的经济发展新体系。正确领会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协调好以下五个关系：

一是供给与需求的动态均衡关系。我国目前不仅存在供给的规模、结构与需求之间失衡的问题，也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传统的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的增长速度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因此，在供给侧改革的同时，必须采取积极措施稳固内需，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二是有效供给不足与产能过剩的关系。既要看到一些领域存在产能过剩和“僵尸企业”，也要看

到在高端制造、高端服务的许多领域中供给还存在很大缺口，在一些核心技术领域仍然存在进口依赖。许多民众赴海外或通过“海淘”方式购买婴幼儿奶粉、保温杯、刀具、陶瓷甚至马桶盖等，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在高品质的日常生活用品领域还存在有效供给不足。因此，对供给侧的改革不是“一去了之”，而是要着力突出“结构性”改革，在消除无效或低效供给的同时，增强有效供给能力。

三是培育新动能与传统产业优化升级的关系。既要看到新技术、新业态正在蓬勃兴起，网络科技、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突破正在重塑经济的许多方面，又要促进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和激发其新的活力。我国在实体经济中具有传统产业基础优势，在重型加工制造、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都形成了产业体系。当前，要善于采用新技术提升传统产业，赋予传统产业新的发展空间；加强水利、铁路、公路、水运、航空、管道、电网、信息、物流等基础设施网络建设；瞄准国际标准提高水平，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四是现代制造业提质升级与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关系。我国的制造业总体上“大而不强”，大多数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附加价值较低，竞争力不强；同时现代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也处在滞后状态，2016年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仅51.6%，在世界各国中明显偏低。因此，要坚持现代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并举，尤其是要着力开拓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增加技术研发投入，逐步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带动制造业向中高端水平提质升级。

五是政府调控与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关系。必须认识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重走计划经济老路，而是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关键性作用。在供给侧结构改革中，去除过剩的产能、降低过高的杠杆、化解过高的库存等，正是为了更好地引导资源配置到效率更高的领域中去；“降成本”则重在优化投资环境，为实体经济发展营造更好的条件；“补短板”强调增进有效供给，夯实经济增长的动能，补足经济发展中的薄弱产业、薄弱环节，建立更加平衡和高效的产业体系。

为此，要抓住“供给侧”改革的机遇，采取新思路新作为，不断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一要大力推动“中国制造品质提升”工程。**要着力培育“创新文化”，培植一批“小而美”“小而精”的中小型企业，促进它们以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深耕专业市场，构建竞争力。所谓“工匠精神”其实长期以来就存在于中国传统制造中，精工细作、精益求精、精雕细刻、追求完美等原本是立足长久发展的制造行业所应有的品质追求。“工匠精神”体现了制造精神中“不易流行”的核心理念。“不易”指的就是即无论世间变化状况怎样也不会改变的东西，“流行”所指的就是追随社会和形势变化而动态变化的东西。“不易”与“流行”看似矛盾，两者在根本上却是相互联系的，只有匠心独具，卓尔不凡，才能创造传世久远的高质量精品。

二要在“去产能”的过程中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一方面要坚决淘汰僵尸企业，尤其是淘汰高耗低效的“五小”企业，改造那些资产负债率高、资产周转率低和盈利能力低下的国有企业。另一方面，要看到过剩行业中也有产品市场需求旺盛的好企业，如果一刀切式地用“限贷”“断粮”等办法推动化解产能过剩，反而会影响产业转型升级。要鼓励这些好企业发展，兼并重组其他小企业，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形成优质供给和有效供给的产业链，提高供给结构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供给体系更好地适应需求结构变化。

三要采取各种有效措施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具体包括：继续推进资源品价格改革，疏通流通渠道，减少流通壁垒，降低企业原材料成本；实施减税、降费和加速折旧，降低企业税费成本；推进金融体系改革，盘活投融资市场，结合国家降息、降准的政策，降低企业财务成本；有序推进养老保险体系改革和户籍制度改革，减少劳动力流动的障碍，降低企业人力成本。

四要采取积极措施改善投资环境和营商环境。包括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深化商事制

度改革，打破行政性垄断，防止市场垄断，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放宽服务业准入限制，完善市场监管体制，切实降低企业隐性成本和制度性交易成本。

发展实体经济，多管齐下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习总书记非常重视实体经济发展，明确指出：“不论经济发展到什么时候，实体经济都是我国经济发展、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十九大报告也再次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为此必须集中力量，促进实体经济做大做强，努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

当前，我国实体经济发展面临着一系列严峻问题，这是由现阶段发展特征决定的，也是在新时代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其一，传统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逐渐削弱，人口红利消失，劳动生产率水平仍然较低，需要开发利用新的生产要素和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其二，重化工业发展中产能过剩问题较为严重，与环境、资源的约束冲突加剧；其三，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较为缓慢，制造业的附加值较低，产业链过短，精细、高端、高附加值的工业产品开发不够；其四，制造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不强，绿色制造水平较低，尤其是内陆地区与沿海发达地区相比，在工业耗水量、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排放和工业固体废物利用率等指标上还存在较大差距；其五，制造业的创新能力仍然不足，拥有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的强势产业和企业不多，研发投入的强度、效益与发达国家差距悬殊；最后，制造业的品牌效应较弱，缺乏在国际上有影响的企业集团和产业集群，也缺乏在全球范围内有竞争优势的著名产品和商标。

长期来看，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唯一源泉，发展实体经济要围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多管齐下地采取有效措施。

其一，消除制度性障碍，不断推动制度创新和市场化水平的提高，这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必然要求。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前期拉美地区市场化改革的经验表明，发展中经济所固有的体制性障碍通常具有较强的“路径依赖”。比如，尽管拉美地区绝大多数国家实现了外向型经济转变，但在总体上其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仍然高于世界其他地区，本国制造的效率水平、质量水平偏低，在很大程度上限制拉美经济参与国际竞争的广度和力度。因此，必须消除体制性障碍，不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具体而言，要明确界定政府的作用，实施法律和制度改革，彻底消除法规程序繁琐、公共服务环境低效、市场进入成本较高、资本市场功能欠缺和僵化的劳动力市场等顽疾，推动实体经济市场化、金融体系市场化水平不断提高，更加充分地加入全球分工与竞争体系，通过强化市场竞争格局来促使企业挖掘潜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水平。

其二，稳步增加研究与开发（R&D）投入，协调地支持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开发研究。我国R&D占GDP的比重一直偏低，2012年我国R&D经费首超万亿，位居世界第三，但是相对投入依然不足，直到2014年R&D占GDP的比重才首次突破2%，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也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水平。分地区看，研究与开发（R&D）经费占全国比重前六名的为江苏（12.6%）、广东（12.2%）、北京（10%）、山东（9.9%）、浙江（6.9%）和上海（6.6%）；研究与开发（R&D）经费投入强度（R&D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达到或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只有北京、上海、天津、江苏、广东、浙江、山东和陕西等8个省（市），绝大部分省份R&D投入强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因此，必须坚持不断地提高R&D投入，尤其要调动企业研发投入的积极性和产业协同创新能力。针对目前R&D投入以实验开发研究、应用研究居多，基础研究非常少的局面，应加大基础研究支持力度，积极捕捉和跟踪全国技术前沿，争取在人工智能开发、大数据开发、高端精密仪器、新材料、新能源等面向未来的技术领域占有先机。

其三，提高经济开放水平，形成以开放促创新的新格局。国内外大量研究表明，贸易开放伴随着国际资本流动、跨国技术转移，对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具有非常显著的促进作用。开放促进全要素生产

率的直接效应在于技术外溢，间接效应在于：一方面，开放的行业具有更大的市场潜力，促使企业进行更多的研发投入，以建立竞争优势；另一方面，贸易开放带来更大的竞争压力，促使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进而提高了整个行业的技术水平。近年来，通过“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国家经济合作架构，中国已经在国际经济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陆续挂牌的 11 个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在对接国际贸易高标准，推进贸易便利化、投资自由化和监管法治化的一系列改革；我国的进出口贸易与投资也再次进入上行轨道。为此，应更加全面地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和全球贸易之中，通过贸易开放带来技术的引进、市场化的扩张、价值链的延伸、新的管理和经济组织创新，进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水平。

其四，由“劳动力红利”转向“人力资本收益”，加快提升人力资本存量和质量。人力资本是所有凝结在人身上的具有经济价值的健康、知识、技能和创新能力等因素的总和，是一切研发和创新活动的载体。“劳动力红利”仅限于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较低的阶段，中国已经面临劳动人口短缺和劳动力红利消失的状况。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自 2012 年以来已经连续 5 年净减少；而我国的劳动生产率仅为欧美发达国家的 1/8，通过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空间很大。所以，必须认识到“劳动力红利”已经消失，要采取有效措施捕获“人力资本收益”。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要从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提高人力资本配置的效率入手，不仅要培养和使用高端研发人才，也要培养和应用一大批优秀的工程技术人员和高技能产业工人，建立产业工人技能等级制度，培育适应新时代、新技术、新发展模式的知识型、技能型、创造型劳动者大军。

构建“三有”经济体制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制度保障

不久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为其他领域改革，为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重要物质条件。会议还指出，我国形成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等收入群体，面临着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等一系列重要工作。世界各国经验表明，中等收入水平发展阶段（人均国民收入介于 1046~12735 美元之间）往往比低收入水平阶段更为复杂和曲折。因此，我国要从中等收入国家阵营中脱颖而出，争取在“大分叉”中赢得上行发展趋势，必须摆脱在低收入水平阶段形成的低劳动成本、低端技术、低要素回报、高资源消耗的发展模式。现阶段是我国大力推动经济升级的关键期，是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攻坚期，必须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现代化经济体制。

其一，确保市场机制有效，大力推进企业成长和产业发展。中国目前的人均 GDP（按可比价格计）水平、城市化水平平均与 1920 年代的美国相近。美国 1920 年之后的半个世纪是其企业快速成长的黄金时期。目前，世界上驰名的美国公司和产品，例如通用电气、IBM、美孚石油、耐克、沃尔玛、星巴克等均在这个时期创立和迅速成长；应对技术冲击和市场竞争变化而生的“超事业部”和“执行部制”等企业制度创新，已成为现代企业制度的典范。我国已经是制造大国，但是多数企业和产业还处在价值链的中低端，迫切需要推进新业态、新产业、新技术、新管理模式的发展，加快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加快迈向“制造强国”，同时通过新兴产业的发展和空间布局，带动形成一批现代化的新型大都市区。

其二，确保微观主体有活力，持续提升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十九大报告突出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贯穿整个经济工作的宗旨，而持续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尤为重要。各国的经验教训表明，许多发展中国家正是由于收入水平提高缓慢，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和贫困问题难以解决，致使广大民众在经济发展中的参与度不高、获得感和幸福感不强，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十九大报告已经明确指出，要坚持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要通过财政和税收政策调节过高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

中等收入群体，形成更合理、更有序的收入分配结构。这不仅有助于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更有助于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

其三，确保宏观调控有度，提升开放水平和综合竞争力。在中等收入水平阶段，经济发展面临着严峻的资源约束和环境约束，也面临更严峻的国际竞争压力，提升综合竞争力成为经济升级的关键。为此，我国应该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打造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流企业。“引进来”要着力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推动创新能力开放合作，以开放带动创新；通过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自由贸易港的探索，消除各地区间的贸易壁垒。“走出去”要切实降低企业隐性成本和制度性交易成本，创造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创新对外投资方式，通过“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国际架构，促进国际产能合作，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网络，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总之，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就要建立增速更稳健、结构更优化、竞争力更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就要坚持“质量第一，效率优先”，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我国经济的质量优势，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强动能、更具活力、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更好地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地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社会全面进步。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8年第2期）

在新发展理念引领下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金碚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并且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经济发展思想。

一、经济活动的实质是创造有效供给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中写道：“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这就是人类经济生活中的供给活动或供给体系，其根本性质就是以生产性劳动创造具有使用价值的产品，因此可以称为实体经济体系。

既然人类进行生产活动，归根结底是为了获取和创造有用之物，那么，发展实体产业，创造有用之物的有效供给，就是人类生产活动的主要内容。而经济增长的本质也就是实体经济所创造的使用价值量的不断增加。这是一个常识性的道理，但人们为什么还会在此问题上迷失方向，因而必须以极大的理论创新来正本清源呢？关键就在于市场经济机制所具有的独特性。

二、市场经济二元性所产生的复杂关系

虽然实体经济的根本性质是创造和实现使用价值，但在市场经济制度下，仅仅有使用价值的物品并不具有经济价值。因为，市场经济是商品交换经济，生产商品的直接目的是用于交换，而不是自己享用。马克思论证了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两重性，而且，市场经济越发达，交换价值的意义就越越来越强。因而正如美国著名《资本论》研究学者大卫·哈维所说：“无论在哪里，交换价值都是主人，使用价值都是奴隶。”

由于交换价值并不受人的消费能力所限制，所以，追求和囤积作为交换价值载体的可保存物品，可以成为无限的目标。而且，尽管物质财富的交换价值是以使用价值为前提的，但这个“前提”却是可以省略的，只要交换价值可以有其他的载体。这个载体就是货币。于是，追求物质财富就会演变为“货

币贮藏”，而且正如马克思所说，“货币贮藏”的不断增长会成为“通例”，而非偶尔发生。更重要的是，现代货币体系是信用货币为主体的制度，信用货币是没有使用价值的交换媒介，并具有财富“索取权”的功能。追求信用货币也会成为“通例”，这就是虚拟经济形成和不断衍化的“基因密码”。虚拟经济的膨胀表现为其标的物价格（资产价格）的飙升，即所谓“泡沫”现象。在这样的经济现实中，原本是为了生产满足人的需要的有用物的经济活动，蜕变为财富“囤积倾向”的疯狂，最后演变异化为货币欲望膨胀。例如，建房买房不是为了住，而是用来“炒”的非理性现象，背离经济发展的本真价值意义。在这样的情形下，经济可以高速增长，以交换价值单位计量的“财富”可以大量增殖，但增长的实质质量不高，甚至远远脱离人类发展的本真目标。

可见，市场经济是人类所创造的一种很有效也很奇特的制度，是一个财富创造的伟大创造。但它具有高度工具理性主义的特点，将原本作为手段或工具的东西变为行为目的；而原本的目的反倒成了手段或工具。这种“目的”与“工具”的关系颠倒，既是市场经济的力量和优势所在，也是其可能迷失方向的潜在危险。

由于市场经济的这一根本性特征，因而在现实中可以看到，市场经济主体所追求的各种目标实际上都是工具性目标：例如，收入、利润、资产增值等，而其极端形态就是作为“索取权”符号的信用货币数值。

不过，人类无论怎样生活在充满货币幻觉的世界，分不清“目的”与“工具”，但是，一旦实体经济遭遇困境，增长乏力，供给体系问题凸显，矛盾严重，人们就不得不迷途知返，回到经济的最实质、最本原层面，把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放到实体经济上。这就是中国必须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要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根本缘由。

三、新发展理念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灵魂

市场经济是人类创造的一种伟大的制度，但由于其固有的性质，人类必须精心构建有效的治理体制来驾驭市场经济的运行，而这种有效治理体制必须基于合理的发展理念。所以，自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着力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即改革必须是“全面”的，是有体现经济发展的本真意义的正确理念所引领的，而不能是过度工具主义主导。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上的进一步提升。而实现这一提升的灵魂则是新发展理念，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一新发展理念深刻体现了人类经济活动的本真价值，也抓住了新时代的主要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很显然，如果不能贯彻新发展理念，没有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难以驾驭市场经济，也难以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

虽然经济活动的实质是创造真实的使用价值，但其运行循环过程也离不开货币金融，而且，人类经济发展在本质上是由科技水平所决定的，而所有经济活动归根结底是人类劳动过程。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

业体系。”这是基于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指导原则。

四、新时代经济发展须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目标的有效契合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共产党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体现在经济发展上就是要“不忘本真，才能美好”，即经济发展不能脱离其根本性的价值目标：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市场经济具有强烈的工具理性倾向特征，只要实行市场经济就必须承认这一现实。这种工具理性的发挥，是导向生产和提供更多更好的有用产品，还是诱致虚拟经济极度膨胀以至破坏生态环境，损害实体经济，损害社会公平？这取决于是否有完善的经济和社会治理体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在发挥市场经济工具理性和实现人类发展的本真价值的高度契合上走出中国道路，并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

对于实体经济来说，货币金融经济是其工具和手段，其实，对于人类发展来说，实体经济也是“工具”和“手段”，即服务于人类生存和美好生活的需要，进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和实现人的能力这一最终价值目标。

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具有价值目标导向的市场经济，而不是忘却初心、背离本真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如果忘却初心、背离本真就会成为一种“坏”的市场经济，即只顾“赚钱”，过度贪婪，无视社会价值和人类发展之本真，往往导致技术创新衰竭、经济增长乏力、社会矛盾凸显。而不忘初心，实现本真的市场经济，才可能是“好”的市场经济，它以更完善有效的治理体系，将市场经济的工具理性机制导入实现价值目标的“社会主义”方向和轨道，保证经济活动能够被规范于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良好秩序中，让实体经济健康发展，使人类能够拥有和享用更多优质产品，生态环境更好，生活质量更高，真正走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这就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本质。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8年第1期）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内涵

杨秋宝

党的十九大明确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我国必须长期坚持与发展的指导思想。2017年12月20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则明确概括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放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来学习、理解，必须深刻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内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包括三个基本方面，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三个方面不是简单堆积在一起，而是有机结合，构成和体现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完整、科学的理论内涵。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取向重点是供给侧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身并没有忽视需求、需求结构或需求侧结构性改革，更谈不上否定需求、需求结构或需求侧结构性改革，但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加突出的是在供给一侧、生产一端推进结构性改革，结构性改革的取向重点是供给侧，而不是需求侧。

从简单的意义上看，在社会经济活动中，需求是指消费者或购买者需要、要求、愿意并可能购买的商品或服务，供给是指生产者或经营者提供、生产、愿意并可能交付的商品或服务。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供给和需求都不仅仅是单一的行为、活动和关系，而是发展形成为系统完整的体系，进而在一定意义上构成市场经济活动的两个基本方面，即供给侧和需求侧。就整个国民经济而言，供给侧就是生产经营、提供商品和服务全部活动的总和或系统，需求侧就是需求形成、购买商品和服务全部活动的总和或系统。

就整个国民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来看，一般而言，需求侧包括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直接影响、决定短期经济增长与发展，主要体现的是短期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总量问题。供给侧则包括与生产有关的一系列要素，主要有人力资源、自然资源（特别是土地供给）、资本形成、技术创新和制度供给等，这些要素更突出、更重要地影响和决定长期经济增长与发展，主要体现的是中长期经济增长与发展的结构问题，实际上就是生产要素效率、资源有效配置问题。一个国家整个国民经济运行和宏观

调控，都是既包括供给侧，也包括需求侧，放弃需求侧谈供给侧或放弃供给侧谈需求侧都是片面的，二者不是非此即彼、一去一存的替代关系，而是要相互配合、协调推进，但总是要有一定的取向重点。

在一个国家经济运行与发展中，整个国民经济管理和宏观调控是以供给侧为取向重点还是以需求侧为取向重点，不是绝对不变的，而是要依据经济发展阶段特征、宏观经济运行状况以及社会经济活动主要矛盾转换作出抉择。我国发展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重大变化，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表明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发展中总量问题与结构性问题并存，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结构性问题更加突出。因此，紧扣主要矛盾的变化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提高宏观调控的有效性，就必须从生产端入手，把供给一侧作为取向重点，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取向重点是供给侧，就是要在不忽略需求侧、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更加重视用改革的办法推进供给一侧的结构调整，促进供给一侧的生产要素有效配置，促进供给一侧的产能过剩有效化解，促进供给一侧的产业发展，促进供给一侧的企业降低成本，促进供给一侧的产品和服务供给，促进供给一侧的结构优化升级，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提高供给的数量、质量、结构、层次、水平、方式、业态等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在供给一侧提升经济增长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进而实现较长时期的稳定经济增长与持续发展。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容重点是供给结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身并没有忽视供给数量、供给数量的调整，更谈不上否定供给数量、供给数量的调整，但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加突出的是对供给结构通过改革方式进行战略性调整，供给侧改革的内容重点是供给结构，而不是简单的供给数量。

供给结构可以理解为是国民经济中供给要素的构成状况、配置层次、比率关系及其内在联系等的总和。构成状况表明不同供给要素的种类、数量、分布等状况，配置层次表明不同供给要素的高端、中端、低端以及高效、低效、无效等水平情况，比率关系表明不同供给要素各自所占的比重、比例大小及其协调、合理、优化等状况，内在联系表明不同供给要素之间相互依存、制约、促进的状态与方式。

供给结构的状况及其转换，是国民经济发展和市场经济运行的极其重要的方面。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不仅在经济整体规模上表现为数量扩张，更重要的是在结构上表现为质量与效益的提升，其实现必然要通过供给结构的合理、优化、升级。供给结构的状况、供给结构的演进、供给结构的优化升级，制约着整个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水平，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进程，合理、高效、优化的供给结构是高质量发展持续、稳定、健康的必备条件。只有合理优化的供给结构在供给一侧为整个国民经济提供支撑，同时供给结构转换与升级不断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极、增长点，整个高质量发展在中长期持续、稳定、健康进行才能成为可能。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容重点是供给结构，就是供给侧改革不是简单地增减供给数量，而是针对供给侧结构性矛盾突出的问题，从生产端进行结构性战略调整，改革、调整供给要素的构成状况、配置层次、比率关系、内在联系等。一是要促进供给要素的有效配置，通过供给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改革，尽

可能去除无效供给、较大幅度减少低效供给、扩大和提升中端供给、不断优化高效供给。二是要促进供给要素的合理构成，使不同供给要素在供给结构中各就其位、各尽其用，都在相应的结构位置上发挥优势，保持增长、发展的势头，促进各种供给要素充分发挥效能，并按照一定的集约度展开，实现按比例的结合及其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同时还要有利于自然环境的保护和生态平衡，实现绿色发展。三是促进供给要素的优化联系，各类供给要素并不是相互孤立、互不影响的，而是应该具有一定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内在联系，当某一要素发生变动，就要通过前向关联、后向关联、侧向关联对其他要素活动产生影响，并且向深层波及，从而构成供给要素之间的不同方向、不同层次、不同方式的内在联结机制。调整、改革供给结构，就是促进不同供给要素之间形成、实现合理的内在联系，在动态的、发展的意义上实现供给要素之间比例关系的合理与协调，发挥供给结构的整体性效应。四是促进供给要素的效率提高，不仅仅要促进单要素生产率提高即劳动、资本、资源、技术等每一类别供给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更要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即在各类供给要素投入既定条件下因结构功能所实现的高于各类供给要素投入的生产率，其重点是要发挥创新驱动、制度改善、管理提升等综合性结构作用，推动稳定经济增长与持续经济发展。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式重点是深化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然要涉及到、包括着供给数量、供给要素、供给结构的变动、增减与调整，但是，这些变动、增减与改革，更加突出地是通过深化改革的方式来实现的。供给侧改革的方式重点是深化改革，是通过深化改革从制度、体制、机制方面促进供给一侧的结构性战略调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时代，我国面临的结构性问题与矛盾是深层次的，深就深在制度、体制根源上，在供给结构方面，无论是产能过剩严重，还是企业成本过高，或者房地产库存过大，等等，根本原因都在于制度、体制、机制不完善，都在于体制、机制存在弊端。而改革，最基本的涵义、内容和要求，就是要破除制度、体制、机制的弊端。只有通过深化改革，才能在制度体制上促进劳动力、资本、土地、资源等各类供给要素的高效投入，在制度体制上促进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管理改善等供给要素的升级优化，在制度体制上促进各类企业、创新创业者等供给主体积极性、创造性和活力的激发，在制度体制上促进供给结构的调整、完善、优化、升级。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式重点，必然就是深化改革，用改革推进供给侧的结构性战略调整。必须用改革的方式推进供给一侧的结构性战略调整，调整各类扭曲的政策和制度安排，加大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市场化改革力度，完善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和机制，最大限度激发供给主体活力，优化供给要素配置，完善供给结构合理优化升级的制度体制保障。

（《金融博览》2018年第1期）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建设 现代化经济体系

刘伟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核心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其内容主要包括两大方面：一是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二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基础上，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推进这两方面建设，均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具有客观必然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全方位、开创性成就，发生深层次、根本性变革。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的重要体现，就是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从根本上决定了必须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运动方式没有变，决定了发展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基础和关键。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但其基本运动方式没有变，仍然是“发展”与“需要”之间的矛盾，解决途径仍然是通过“发展”满足“需要”。因此，尽管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但“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意味着发展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它通过使供给体系有效适应需求结构变化，从而使“发展”与“需要”相互联通并且有效匹配。因此，在新时代，发展特别是作为社会发展基础的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需要从供给侧发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社会主要矛盾的内涵发生深刻变化，要求在发展中必须下大力气解决供给侧问题。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运动的两端——“需要”和“发展”本身的内涵发生了深刻历史性变化，从而使社会主要矛盾运动的内涵相应发生深刻变化，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当前，制约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因素是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这种不平衡不充分的根源在于供给的质量和效益、结构和水平以及创新能力不够高，表现为实体经济水平有待提高、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脱贫攻坚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大等。这些突出问题，本质上是国民经济供给侧的问题，根本原因是生产力不够发达，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在解决结构性问题，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根本出发点是使我国供给能力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美好生活需要，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只有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才能解决重大结构性失衡，为彻底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奠定坚实物质基础。

有效化解当前经济运行中的风险，需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现代化经济体系必然是能有效应对风险的经济体系。当前，我国经济“双重风险”并存，既有成本推动的潜在通货膨胀压力，又有需求疲软导致的经济下行风险，其原因主要集中于供给侧。比如，出现潜在通货膨胀压力的主要原因是供给侧的要素成本上升；投资需求增速放缓的深层原因在于供给侧创新能力不足，难以找到有效投资机会；消费受到一定抑制的主要原因是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不足。因此，克服“双重风险”并存的新失衡，需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抓住了建设协同发展产业体系的关键

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抓住了建设协同发展产业体系的关键。

全面提高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水平。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不论经济发展到什么时候，实体经济都是我国经济发展、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发展实体经济是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的核心和关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任务正是振兴实体经济。与需求侧管理把着力点放在需求端、消费者不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力点在于供给端、生产者。这主要包括三类：一是作为第一生产要素的劳动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着眼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二是与生产资料结合的企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眼于提高企业竞争力，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三是企业与企业的集合——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完善产业组织，优化产业结构，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支持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这些举措必将激发经济活力，加快增长动力转换，全面提高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水平。

全面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质量。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质量是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眼于用新供给引领需求发展，从三个层面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和产业质量提升。一是优化科技、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配置和组合，提高生产要素利用水平，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不断增强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二是优化现有供给结构，通过调整现有产品供给结构、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从深层次上解决供给同需求错位问题；三是促进产业优化重组，大力发展新产业和新业态，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提供新的产品和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生产端入手，在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全要素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和企业竞争力的基础上，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全面提升产业素质和质量，为经济持续增长

培育新动力、打造新引擎，契合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的要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利于实现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

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在于实现三者有机统一。只有三者有机统一，才能最大限度破除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各种束缚，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才能避免经济大起大落，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才能激发全社会创造力和发展活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属性是深化改革，要求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深化价格、财税、金融、社保等领域基础性改革。只有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才能成功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

有利于实现市场机制有效。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原则。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像需求管理那样停留于总量干预，而是要深入影响生产者和经济结构，因而对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了更高要求。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要求既遵循市场规律、善用市场机制解决问题，又让政府勇担责任、干好自己该干的事。为此，要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完善市场机制，打破行业垄断、地方保护等，增强企业对市场需求变化的反应和调整能力，提高企业资源要素配置效率和竞争力。要发挥好政府作用，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用改革激发市场活力，用政策引导市场预期，用规划明确投资方向，用法治规范市场行为。

有利于提高微观主体活力。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要求深化产权制度改革和要素市场化改革。深化产权制度改革的目的是使各种所有制经济和各种类型的产权得到清晰界定、严格保护和顺畅流转，以保障良好市场秩序、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稳定市场预期。现阶段特别需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同时，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的目的是贯彻等价交换原则，提升市场竞争的公平性和真实性，现阶段特别需要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与做法，尤其是打破行政性垄断、防止市场垄断；同时，完善市场监督机制，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决定价格的作用。通过这两大改革，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有效提高微观主体活力。

有利于实现宏观调控有度。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要求改变宏观调控方式，把总需求调控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统一起来，把短期调控与长期调控、总量调控与结构调控统一起来，以适度的总需求管理创造经济稳定增长的有利环境，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总量失衡深层矛盾的有效解决。当前，应大力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健全财政、货币、产业、区域等经济政策协调机制；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健全金融监管体系，不断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预见性和有效性。

（《人民日报》2018年1月26日）

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王晓东

党的十九大作出了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部署，强调“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1月30日，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同志指出：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由社会经济活动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相互关系和内在联系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其中，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实现市场准入畅通、市场开放有序、市场竞争充分、市场秩序规范，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

一、市场体系建设在现代化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关键在于推进“六个体系”的建设，包括产业体系、市场体系、收入分配体系、城乡区域发展体系、绿色发展体系、全面开放体系。而现代化市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对于其它五个体系乃至整个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建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现代化市场体系促进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建设。构建产业新体系要求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体制，现代化市场体系有利于应用基础研究的产业化过程，在科研院所与企业之间发挥中介作用，促进科研成果转化。此外，现代化市场体系还有利于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有利于企业创新产品的价值实现，在企业与消费者之间发挥中介作用，保证创新的持续进行。

现代化市场体系促进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建设。收入分配直接涉及利益问题，关系到促消费和扩内需。收入分配的直接表现形式是最终产品在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分配，而影响收入分配的还包括生产资料的分配、社会成员在各类生产之间的分配。以上两种分配包含在生产过程中并决定生产结构，最终产品的分配只是上述分配的结果。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准入畅通、开放有序的市场体系有利于提高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配置效率，并进而激发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竞争充分、秩序规范

的市场体系有利于实现要素市场与产品市场的公平竞争，实现劳有所得，提升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的获得感。

现代化市场体系促进彰显优势、协调联动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建设。城乡区域发展体系建设包括以乡村振兴战略为核心的城乡协调发展和不同区域的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要求把城镇化进程和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既要“造城”也要“造村”，而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然而小规模、低集中的小农户，与大规模、高集中的现代农业之间，存在时间、空间、信息等方面的分离，难以实现产销直接对接。现代化的市场体系则在二者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分散的小农户通过市场实现时间、空间、信息的集合，现代农业通过市场实现时间、空间、信息的分散，流通企业在这一过程中成为市场集散职能的主要承担者。区域的协调发展意味着优化发达地区的发展方式，支持资源型地区的转型发展，加快贫困地区发展。不同区域应立足于资源禀赋特点，形成产业链的合理分工与产业结构的合理配置。培育和发挥区域的比较优势一方面意味着生产要素实现跨区域自由流动，从而满足分工对生产要素种类的需求，也使各区域立足比较优势形成专业化的发展模式；另一方面意味着最终产品能在更广阔的区域范围内销售，满足不同地区的消费者对产品的多样性需求，从而加速产品的价值实现过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化市场体系在实现生产要素的配置和最终产品的流转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中介作用。

现代化市场体系促进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建设。市场的规范有序可以直接使高污染、高能耗、生产方式不符合环保标准的企业退出市场。此外，具有绿色循环、低碳环保特点的产品需经由市场实现其价值，准入畅通、开放有序、竞争充分的市场体系有助于消费者实现对产品特点的认知，进而促进产品价值实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产工艺与生产技术也需借助市场，溢出扩散至其他企业，实现生产方式的整体转型提升。

现代化市场体系促进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建设。结构优化、效益提升的开放体系不仅包括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标志的对外开放，也包括内陆省份、沿海、沿江、沿边的境内开放；不仅包括针对外资的高水平“引进来”，也包括国内企业的大规模“走出去”；不仅包括商品市场、初级要素市场的深度拓展开放，也包括技术、人才等高级要素市场的深度拓展开放。然而，对劳动力禀赋的依赖容易使比较优势大量集中于传统产业部门，很难实现对高级生产要素的充分利用，并转化为自身的生产和研发能力，并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被迫”处于低端锁定地位。现代化的市场体系通过调整供需匹配、减少区域间市场分割等方式促进企业对高级生产要素的吸收利用，安全高效的开放体系通过信息扩散、价值链组接等方式推动了企业“走出去”，特别是通过参与“一带一路”的建设，实现开放体系的效益提升。

产业体系、市场体系、收入分配体系、城乡区域发展体系、绿色发展体系、全面开放体系共同构成了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统一整体。市场体系与其他各体系间有着紧密的、有机的联系，在一体推进、一体建设时应当重视其内在联系、相互作用。

二、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市场体系的根本要求

市场准入畅通、市场开放有序、市场竞争充分、市场秩序规范是现代化市场体系的题中之义，也是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市场体系的根本要求。

市场准入畅通包括三方面内涵。首先是开放行业准入，“法无禁止皆可为”，凡是法律法规未明确禁入的行业和领域都应该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凡是我国政府已向外资开放或承诺开放的领域都应该向国内民间资本开放。其次是简化行政审批，精简涉及民间投资管理的行政审批事项和涉企收费，规范中间环节、中介组织行为。再次是拓展融资渠道，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小微企业融资渠道狭窄，民营企业资金链紧张，在进入一些风险性较高、资本需求较大的行业时面临先天困难。健全完善金融体系，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可靠、高效、便捷的服务，有助于实现中小企业的市场准入畅通。

市场开放有序一方面意味着深化行业的有序开放，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另一方面，意味着优化区域的有序开放，加大西部开放力度。**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此外，“引进来”与“走出去”是对外开放的一体两翼，“一带一路”建设对构建有序开放的市场也具有重要意义。

市场竞争充分应注重统一市场的构建。在区域层面消除地方保护主义的藩篱，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在产业层面打破行政性垄断，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放宽服务业准入限制，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尤其是民营企业的活力，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

市场秩序规范应理顺不同主体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就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而言，应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增强金融行业等虚拟经济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就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而言，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推动国有资本做大做强做优，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就传统经济与创新经济而言，既要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同时也要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手段对传统制造业、传统服务业进行改造，注重创新经济对传统经济转型升级的带动作用，提升经济发展质量。

市场准入畅通、市场开放有序、市场竞争充分、市场秩序规范四个方面内容既各有侧重，又彼此联系。市场准入畅通意味着企业具有正常的进入与退出机制，有助于开放有序、竞争充分的市场体系构建。市场秩序规范则是市场准入畅通、市场开放有序、市场竞争充分的重要支撑与保障。正如在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过程中要重视各体系间的一体推进，一体建设那样，构建现代化市场体系也应注意各方面之间的内在平衡和有机联系，不可偏废。

（中国社会科学网 2018 年 2 月 5 日）

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中的绿色考量

葛新权

一、绿色发展的重要意义

生态文明与和谐社会建设中，需要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日益增长的需求，包括人们生命、生理、成长与追求的物质需求，也包括精神、文化需求，还包括生态环境友好、和谐宜居需求。

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中，需要以“创新、协调、绿色、共享、开放”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导，以绿色发展为抓手，引领创新、协调、共享、开放发展，把绿色发展植入现代化经济体系，通过绿色发展，牵引低碳、节能减排、环保、生态、回收循环再利用，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创新发展过程中，倡导源头绿色创意、开发与设计，中端绿色试制、测试、制造、生产、包装与物流，末端绿色销售、消费与回收循环再利用。在协调发展过程中，强调产业之间、产业与资源、生态与环境的协调，还强调在产业及其产业间发展过程中实施绿色发展下的低碳、节能减排、环保、生态，以及回收循环再利用。

对于协调与协同的关系，在社会经济系统中，我们认为协同是目标，协调也可以被认为是目标。但把协调作为一个过程更有价值、更符合实际。为什么呢？协同是生物所具有的生理特征。如我们走路中，你从后面观察，就会发现我们的两个脚后跟非常接近。但不会碰着，否则就摔倒了。这就是生理特征。即使小孩学走路的时候，也不会因为脚后跟碰着而摔倒。在可控制的环境下，如机器人，通过使用计算机仿真模拟可以实现这种生理协同的功能。但对于社会经济系统来说，因它是我们人类活动的复杂系统，不存在这种可控制的环境，所以对社会经济系统来说，就不可能实现协同，也没有协同，协同只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只能根据实际情况，向着协同目标方向进行实时调整，永无止境。因此，可以把协调理解为一个过程，即追求协同目标而持续调整的一个过程。最重要的是，需要在判断协调与否的准则中，引入具有“一票否决”的绿色发展考量。

在共享发展过程中，无论是人才、技术、资本等资源，还是市场、研发、产品制造、产业价值链，还是市场、合伙制等共享，都需要强调共享利益各方遵守竞争与合作博弈规则，还需要强调对各方履行保护资源、生态与环境的责任进行审核、监管与追责，以实现绿色发展下共享的正向外部性竞争、合作与共赢。这里，还需要强调一点，除博弈规则外，还需要考虑文化博弈，对竞争与合作博弈中弱势的利益方，尤其是不可替代的弱势利益方

给予必要的补偿。这是长期合作需要的，也是怀有远大眼界、胸怀、责任的强势的利益方需要的。

在开放发展过程中，毫无疑问，在全球化、信息化下开放是必要的，但开放有一个前提，即开放的双方或多方在相互需求中实现优势互补、互利互惠。

在绿色发展中，我们需要考虑绿色需求。所谓绿色需求，就是随着消费者保护生态、环境意识提高，他们对生产者提出的资源、生态、环境保护的需求。可以讲，这种绿色需求才是消费者的有效需求，至少是潜在的有效需求。特别地，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对“走出去引进来”，不仅考虑资源互补、技术互补、人才互补、产品互补与需求互补，还需要考虑技术、生产、产品、消费，以及生态与环境的绿色需求。因此，以绿色需求拉动“一带一路”，才会有生命力。正如 2017 年 1 月 17 日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所言：我们要坚定不移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会和利益、实现互利共赢。次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的主旨演讲中，又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的中国方案。

二、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绿色化分析

由以上分析，绿色发展是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必然选择。我们认为，新时代经济体系的“现代化”，不仅体现在“创新、协同、共享、开放”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绿色化”上。2015 年 3 月 24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首次提出绿色化，十八大进一步把绿色化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在“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中加入了“绿色化”，并且将绿色化定性为“政治任务”。绿色化是一种“高科技、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具绿色生产、绿色产业新的经济增长点”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也是一种“勤俭节约、节能环保、低碳、文明健康，力戒奢侈浪费和过度消费”的绿色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也是一种“尊重人才，敬畏自然，保护生态环境，推动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形成生态文明文化”的价值取向。总之，绿色化是基于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与启示，选择生态文明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必由之路。

下面，我们提出从“五生融合”、“五观价值”、“五全要素”，以及城乡协同、虚实平衡、排放“优先”等方面，对现代化经济体系进行绿色化分析。

“五生融合”。“五生融合”是指生命、生理、生活、生产、生态的融合。在传统“三生融合”中增加生命、生理，以强调人类的自然属性，是实现人类与自然和谐平衡的本原要素。“五生融合”是企业、产业，以及经济发展，还有我们消费与投资，都应遵循的基本理念与原则。也就是说，人类一切活动与发展要满足其生命、生理、生活、生产的需求，更要满足社会和谐与生态环境的需求，即通过绿色需求实现人类及其活动与社会、自然和谐平衡，否则发展的代价是巨大的。在国内外过去的发展过程中，过度的需求、生产、消费，导致对自然资源与环境过度索取、浪费与伤害，远远超出自然的自愈能力和人类的治理能力，给我们留下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特别地，“五生融合”中的“生产”是指体现人类一切活动的绿色生产，它承载着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其目的是实现现代化经济体系绿色化建设，并满足我们人类的生命、生理、生活、生态绿色需求，尤其满足极简生活的绿色需求、社会与自然和谐需求。

“五观价值”。“五观价值”是指从业观、环境观、财富观、消费观、幸福观。人类一切活动与发展能否与社会、自然和谐平衡，取决于我们人类所秉承与坚守的价值观。我们认为，人们的从业观、环境观、财富观、消费观、幸福观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从业观，倡导依兴趣从业，做事情追求做精、做出品牌，如中国建筑鼻祖鲁班，制陶、制茶、

制药、制砚、铸剑大师，以及剪纸、泥塑、铁锅传承人等，他们一辈子只做一件事且做到极致；环境观，倡导尊重社会、企业、家庭、个人，敬畏资源、生态环境并承担责任，建立环境友好关系；财富观，倡导贡献社会，完善、成就自己，平衡物质财富与精神、文化财富；消费观，倡导满足美好生活的相对物质需要，鼓励简约生活消费，追求绿色消费、精神与文化消费，保护生态环境；幸福观，倡导尊重平凡与卓越，追求健康、快乐，感恩绿水青山，享受美好学习、生活与工作。因此，在绿色化发展，我们可以把“五观价值”高度概括为绿色观。作为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主体，我们能否把经济体系建成绿色化的体系，取决于我们能否从业、环境、财富、消费、幸福方面真正树立绿色观，并落实在行动中。

“五全要素”。“五全要素”是指人才、科技、资本、制度（政策）、文化。无疑，制度与政策是不同的，但都有宏观与微观层面之分，这里我们主要指宏观层面上的制度与政策。制度与政策是我们创造（制定）出来的知识产品，从这一点上把它们概括为一类。当然文化也是知识产品，但它不是短期创造（制定）出来的，而是需要通过长期营造、积累形成。在传统的全要素生产率分析中，关注的要素是劳动力、资本，以及科技进步代表的科技。根据过去的经验、教训与启示，在人类活动，尤其知识经济发展的今天，劳动力、资本和科技进步不可缺少，但还有重要的要素。为此，我们提出人才、科技、资本、制度（政策）、文化组成的“五全要素”。人才具有智慧，可以创造出新思想、科学、技术、设计、工艺、艺术、制度（政策）、文化等知识。相比之下，“五全要素”突出人才、制度（政策）、文化的重要性，是人类活动与社会经济发展中所需的、不可缺少或替代的要素。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中，我们比任何时期都更需要支撑绿色发展的现代化的人才、科技、资本、制度（政策）和文化。

城乡协同。由于我国现实存在的城乡差异，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中，应从这个实际出发，并着力减少差异，提高城乡均衡发展的一体化程度。在绿色发展中，农村发展有着较大的空间，大有作为。城市发展面临着巨大排放压力，农村发展比城市发展有着得天独厚优势，为发展循环经济提供巨大、可能的空间与容量。因此在整个绿色发展“一盘棋”中，城市应对农村的绿色化贡献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给予补偿，有利于利用后发优势，把城市向农村转移的产业发展成为低碳、节能减排、环保、生态的绿色产业，统筹城乡环境建设，防止诸如忽视或忽略农村根本、深层次的问题，以及损害农村绿水青山等后发劣势，实现城乡经济循环。对于城市经济发展，首先，需要与智慧城市建设相融合，城市经济支撑智慧城市建设，智慧城市反哺城市经济发展，依靠智慧发展区域中心大城市，以及大城市群；其次，需要与国企改革中的所有制混改相融合，以激发新时代下新制度的新活力；第三，需要与质量、品牌、专利与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相融合，尊重创新者，尊重企业家，尊重劳动者，培育创新与工匠精神；第四，需要大力度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防范金融风险，抑制资产泡沫，并与绿色发展相融合，以低碳、节能减排、环保、生态推动循环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对于农村经济发展，首先，落实 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部署，如期完成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三大目标任务；其次，大力深入推进精准扶贫工作，在保护下选择绿色产业，开发利用农村资源，既保护绿水青山，又实现脱贫目标；第三，大力推进“三农”融合，提升农村市场经济竞争力；第四，大力推进农村城市化与生态城市建设，提高农村城市化水平；第五，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技能教育，鼓励城市人才向农村流动，以满足乡村振兴所需要的人才。

特别地，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中，需要基于绿色发展，统筹城乡，引入绿色化要素，

进行价格体系改革，尤其是农产品价格改革，平衡城乡利益，保护农业发展和农民收入，实现城乡经济平衡可持续发展。

虚实平衡。鉴于我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存在的失衡现象，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中，以绿色发展推进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融合平衡是十分重要的。目前，一系列加严的金融、保险、证券与股市监管政策与措施出台实施，对解决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失衡，大力发展实体经济，让虚拟经济回归服务于实体经济，都取得了进展，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提供了必要的基础。但这还远不够。在绿色发展下，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形成融合平衡，是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长期而艰巨的任务。特别地，在大力发展绿色实体产业基础上，需要大力发展绿色生产性服务业，为生产提供优质的中间服务，加速第二、三产业融合。一方面，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2017年印发的《服务业创新发展大纲（2017—2025年）》，促进生产服务、流通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发展，提升对区域产业升级的支撑能力，促进绿色发展；另一方面，需要对第三方的服务业进行规范与监管，维护市场公平竞争，优胜劣汰，提高服务质量与水平。今后需要加大对研发设计与其他技术服务、节能与环保服务、商务服务等的支持，制定和完善统一的行业标准和服务标准，同时继续加大对金融服务的监管，引导服务业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再一方面，在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同时，加大制造业及其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通过绿色低碳循环的制造业集聚发展，发挥产业集聚效应和规模经济作用，反过来促进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有效需求。

排放“优先”。无论城市还是农村，经济发展必然产生排放，通过对排放全过程处理后达到排放标准。不达标的排放是非法的，对保护生态环境具有破坏性。在保护大气、水、土壤、生态，以及绿水青山前提下，在排放达标的情况下，随着经济发展总量增长，排放总量是增加的，此时我们需要考虑，这个排放总量是否在我们的处理能力容量或环境所能接受的达标容量内？如果排放总量在这两个容量内，则此时的经济发展是可以接受的。如果排放总量超出了处理能力容量或环境所能接受的达标容量，则因短期内不可能增加处理能力容量，需要选择降低经济发展总量，减少排放。因此，在绿色发展下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中，需要考虑经济发展与减排的关系，并且当发展与减排发生冲突时，我们应选择减排“优先”，即减缓发展，控制排放。特别地，一方面，城市发展规模不能超出其排放处理能力和容量。另一方面，城市生活垃圾及其他废固治理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差距还是很大，显现出“垃圾围城”现象。随着农村经济与城市化发展，以及城市向农村转移，农村的生活垃圾及其他废固比城市严重得多。可以说，农村，特别是偏远农村是生态环境最后一根“稻草”，如果污染了，那将是全面毁灭性的灾难，应引起高度重视。为此，需要把城乡的生活垃圾及其他废固减量治理纳入现代化经济体系中，依“技术+制度（政策）+文化”融合破解技术、制度（政策）、文化瓶颈，全面实现城乡零废弃。

三、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绿色化建设

由以上对现代化经济体系绿色化的分析，我们认为，为满足“五生融合”绿色需求，需要基于绿色观，利用“五全要素”进行绿色化生产，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绿色化建设。

从人才要素考虑。这就需要思考教育，包括幼儿、中小学教育（家庭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或高等教育，以及社会教育（进入社会后的实践、继续、终身学习）。教育是人才的源头，人才培养是一个从幼儿、中小学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或高等教育，以及社会教育长期学习、积累与成长的全过程。我们认为，不同的教育阶段对人才培养都有所侧重，

幼儿、中小学教育侧重培养做人，职业技术教育侧重培养工匠，高等教育侧重培养高级专业人才，而社会侧重培养做真正大写的人。可见，一个有思想、有道德、有创造、有作为的人才成长，源自教育全过程培养与他们自身的努力。从绿色发展来讲，绿色概念应融入幼儿、中小学教育，绿色制造融入职业技术教育，绿色设计融入高等教育。特别地，在高等教育中，需要抓住“双一流”建设机遇，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淘汰一些低水平重复的学科专业，以绿色发展为契机，建设一些超前性或一流学科专业，支撑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人才需要。同时，需要对高等学校进行分类指导，鼓励一些普通高校，大力培养满足绿色制造业需要的、具有工匠精神、企业家精神与能力的专业人才。

从科技要素考虑。人才重要，但培育人才不仅需要科技项目支持，还需要科学合理的科技政策，以及良好的科技环境、科技文化。对于绿色发展来说，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科学、哲学社会科学，以及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对策研究都很重要，因此在项目立项分配上不能偏颇。基于过去的经验与启示，一方面，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取得了一些成绩，既提高了学术水平、地位与影响力，又为社会治理、经济发展与政府决策提供了科学咨询，把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科学同等重要落在了实处。另一方面，为加强基础研究，谋划未来科学发展，2月11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对全面加强基础研究作了部署，明确了我国基础科学研究“三步走”的发展目标：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重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涌现出一批重大原创性科学成果和国际顶尖水平的科学大师，为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世界科技强国提供强大的科学支撑。我们可以预见，基础研究将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大有作为，进而为未来的应用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我们认为，需要加强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机等理论基础研究，以及绿色产业融合发展研究。如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曾经表示，“语言理解是人工智能领域皇冠上的明珠。”因此，人工智能的突破还体现在自然语言的理解。又如中国工程院潘云鹤院士在2017年首届世界智能大会上所言，“人工智能”就是让机器像人那样认知、思考和学习，即用计算机来模拟人的智能，如机器定理证明、机器翻译、专家系统、博弈、模式识别、学习、机器人和智能控制。随着信息环境、社会需求、人工智能基础和目标的巨大新变化，基于大数据、互联网，群体智能应运而生，以及信息化从数字化、网络化，到智能化，为人工智能基础与应用研究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再又如，根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IFR）的统计，2016年制造业的机器人密度在全球范围内增加，2016年全球工业机器人平均密度为每万名员工制造74台工业机器人，比2015年工业机器人密度增加了66倍，显示出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用自动化满足制造业需求的发展趋势。从IFR的报告显示，2016年机器自动化程度最高（每万名工人拥有工业机器人台数）的国家依次为韩国（631台）、新加坡（488台）、德国（309台）、日本（303台）、瑞典（223台）、丹麦（211台）、美国（189台）、意大利（185台）。可见，我国在工业机器人应用上还有较大的差距。再一方面，从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科学、哲学社会科学，以及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对策研究上，加大支持现代化经济体系绿色化建设的项目立项，实现以科技引领、支持与服务绿色经济发展。鉴于立项是培养青年科技工作者（青年教师）一个重要抓手，也是培养青年科技工作者成长过程中不可缺少的投入（成本），所以对青年科技工作者，只要其态度端正、认真踏实负责，就应给予必要的倾斜立项机会，而不应过度关注他们的经历、经验与学识等短板，更不应像对待杰出科技工作者那样“吹毛求疵”。这样，才能使得我们绿色发展事业中人才队伍可持续发展。

从资本要素考虑。这里不仅要考虑有形资本，还要考虑无形资本，以及知识资本、智慧资本等。无形资本包括知名度、信誉、商誉、经营管理能力、企业文化，以及品牌、

产品形象、企业形象等。在知识资本与智慧资本中，知识与智慧是不同的概念。我们认为，知识为人类大脑劳动的成果，包括思想、科学、技术、设计、工艺、艺术、制度（政策）、文化等知识。而智慧是生物所具有的基于神经器官（物质基础）一种高级的综合能力，如感知、理解、记忆、联想、逻辑、辨别、计算、判断、分析等多种能力。可见，智慧是对人类创造知识能力的表达，有智慧的人，还需自己的努力才能创造出诸如思想、科学、技术、设计、工艺、艺术、制度（政策）、文化等新知识。20 世纪 40 年代初，海蒂·拉玛与作曲家乔治·安塞尔合作，受钢琴键跳动启发，发明了“跳频技术”，最先提出通过频率跳动来扩大通讯容量并保密信息的方式，研制成了以自动钢琴为灵感的模型，这项技术是今天通信技术 CDMA 的基础。没有这项技术，今天也不会有 WIFI。海蒂·拉玛用她的智慧，以及思想、技术等知识改变了世界。

在绿色发展中，一方面，在绿色产品生产与服务提供中，需要投入有形资本，形成少量的无形资本，或投入有形资本和少量的无形资本，形成较多量的无形资本，或投入有形资本和较多量的无形资本，形成更多量的无形资本。可见，无形资本比有形资本需要更长时间的积累，在绿色发展中更是如此。另一方面，无论有形资本还是无形资本的投入，都要满足现代化经济体系绿色化建设的需要。同时，加强资本运作与流动规范和监管，让资本优先用在绿色化建设的“刀刃”上，实现绿色发展。特别地，知识是知识经济的第一要素，以互联网经济、共享经济为代表的知识经济发展，需要投入大量的知识与知识资本。在智慧城市建设中，需要投入大量的智慧与智慧资本，应用人工智能治理城市建设中面临的诸如地震、地下排水、排污排废管道、水电通讯网线布局，交通、风道、（产业、社区、商业、学校、休闲、公共服务等）空间布局，以及建筑物选材、造型、外观色彩、灯光装饰等产生的自然灾害、污染、水火煤气事故、交通拥堵、雾霾等。

从制度（政策）要素考虑。做任何事情，尤其在新时代，只拥有人才、科技、资本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制度（政策）。无规矩不成方圆，相对来说，制度（政策）是硬约束，是刚性的，是宏观和原则性的。我们需要从绿色理念与绿色发展角度，制定并实施有利于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制度（政策），如绿色发展的市场准入、监管、调控制度（政策），为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营造良好的制度（政策）环境，又如我国已经开始实施《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环境污染刑事案件追责、大气污染防治治理不力的领导干部追责等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当然还需要全覆盖、无死角，加大宣传普及与惩戒追责力度，为保护绿色发展营造良好的追责与法律环境。

从文化要素考虑。在新时代新制度（政策）下，还需要营造绿色文化。相对于制度（政策）来说，文化是软约束，是弹性的，且微润柔和，积微致着。有了制度（政策）就必须执行，而文化包容差异。同时，文化能够对制度（政策）“双刃剑”的负面起到减弱与抚平作用。为此，需要大力落实 2017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在挖掘、传承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还需要梳理并清除文化中的“糟粕”，营造人人钟情文化精华的氛围，通过公开公正公平的机制制度（政策），消除“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老实人吃亏”，以及选人用人中“逆向淘汰”等现象，为现代化经济体系绿色化建设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

（中国社会科学网 2018 年 3 月 1 日）